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18 期

【思想文化】

什么是党文化/ 守 鹤

——《党文化特性》编者前言

【百年国史】

“北京政变”揭密——冯玉祥其人其事/燕都野叟

画说我的一生（22）/刘海鸥

——手足离散（1965—1976）

【评论】

变幻莫测的“游击” /文 靖

季羨林谈北大的两派/向南雷

【怀人】

清明祭：悼念我的丈夫蔡鸣乔/苗致平

【述往】

我的初恋/石名岗

两期“社教”及文革/盛天任

我亲历的“清查 516”/林 海

【访谈】

李春光：没想到中国变成今天这样 /文 静采访 整理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什么是党文化

——《党文化特性》编者前言

守 鹤

党文化是共产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和体制模式的统称，是这三者有机结合的综合概念。

朱厚泽对党文化的评论是：党文化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外来激进经验与中国传统中的不良因子之“劣势组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它反映一党专制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既有精神形态，又有其制度形态。

党文化的特征是以“党”的名义、“集体”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垄断一切权力，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它在经济上就是以“社会”的名义消灭私有制，并实行计划经济；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党专政；在文化上就是钳制全社会的思想，消灭一切异议。党文化讲究的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党文化在对待民众上是愚昧主义，在国家制度上是极权主义，而独立人格的失落和组织控制的成功，正是社会悲剧产生的根源。

对党文化有多种称呼，如“极权主义”“共产体系”等。早先，刘宾雁把它简称为“极左”，他说：“极左”力量是一种相当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存在。它既显示为一条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路线，又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和经济分配制度；它既滥觞于中国专制传统制度，又与西方哲学、政治思潮有关；它既是中国历代、尤其最近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的现代继续，又是斯大林型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版。它的种种表现形式，诸如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偏执疯狂、残忍奸诈、拒绝演变、鄙视生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无忏悔之心、决无宽容之度等等，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丑恶。

刘宾雁强调：极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否定，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简单说：不把人当人。它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

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

把党文化作为重大课题提出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知，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六四”之后。朱厚泽说：“党文化的问题是在成都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后这场全面反思，使人们不得不在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问题。九八年我们在成都已经看出改革已经是走不动路了。怎么往前走？全部堵塞了。这样，李锐提出毛泽东的问题不解决是不得了的。我们几个在楼下的门厅里提到了党文化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已经形成了那么一个东西”。李锐提出要批透“毛”，朱厚泽对这句话作了解读和发挥：批党文化就是要回顾和反思一个世纪以来共产革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并对它们做出彻底的清算。❏

【百年国史】

“北京政变”揭秘 ——冯玉祥其人其事

燕都野叟

1924年霜降前两天（10月22日，星期三），遛早儿的北京人发现，东西交民巷、台基厂、水关等通使馆区路口，全为身穿灰军装大兵封锁，许进不许出。老北京认得，这是冯玉祥（字焕章，1880~1948）的兵。

第二天，报上有冯玉祥通电，责令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发布命令：立即停战，罢免吴佩孚（字子玉，1874~1939）“讨逆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任其为青海垦务督办，云云。

北京百姓雅好议政：“二哥，这冯玉祥不是曹大总统和吴大帅手下吗？要造反？篡位？”“这不废话吗，不造反怎么篡位？全想着进中南海当皇上呢！您呐，不想？”“我？做梦都想当皇上他爸爸呢，可我还得当孙子拉洋车！”“狗咬狗一嘴毛，大兄弟，您快把豆汁儿喝干净喽腾地儿罢。”……

百姓嘴里的“篡位”，史书上称“北京政变”。尽管民国史家对它早就按规定调好了音，定好了调，但在史实面前，这音这调可疑可议之处多多。而要弄清事情原委，还须从头说起。

1916年6月，袁世凯“驾崩”，各路军阀欢天喜地，全想过一过大总统的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个个奋力亲躬。1920年7月，以曹锟（1862~1938）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1865~1936）为首的皖系开战，因奉军力助直军，皖败直胜。奉系大老张作霖（1875~1928）乘机在北京设了司令部，以一万多大洋“买”下阜成门内麻线胡同顺承郡王府做官邸。靠吴佩孚吴大帅打天下的曹锟暗下决心：早晚要把你这个“胡子”（土匪）赶回老家去。

那时的奉军，大体为各路土匪武装的拼盘儿，干绑票杀人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在行，与吴佩孚的正规军对阵就不灵了。故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兵败如泄洪。直系操控了北京政府，明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

张作霖吐出一口吴东烟，挥了挥玉石嘴儿小烟袋，立马通电全国：东三省自即日起独立，并自封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名副其实地当开了“东北王”。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历届总统内阁，都成了军阀的附庸，政府开销全靠枪杆子敛财维持。到了直系坐大，曹锟以几千万民脂民膏购买国会议员（人发5000大洋），居然当上了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吴佩孚自命不凡，久蓄荡平各地军阀，一统天下之志。决定先拿张作霖开刀。岂知张颇有头脑，1922年战败之后，启用留日少壮派，整兵经武，造枪买炮，短短两年，奉军即脱胎换骨，战斗力大增，成了正规军。

1924年6月，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干将齐燮元打开了“江浙战争”，曹锟发布大总统令讨卢。这一下，让张作霖逮着了出兵的机会，马上通电，奉军兵发山海关，以镇武军名义讨卢。曹锟急得要死，连电驻军洛阳的吴佩孚火速北上救驾。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9月拉开序幕。两军20余万人马在长城外互有进退之时，冯玉祥所领“讨逆军”第三军，突然前军变后军，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逼其发布政令，通电全国。直军遂全线崩溃，吴佩孚败走湖北，从此不振，淡出政治舞台。

1949年后的史著中，对二次直奉战争描述大抵如此。然对至关重要之“北京政变”则多取含混态度，或几语带过，或语焉不详，更有甚者，竟把此役说成“是冯玉祥将军革命历史中光辉一页”等等。

冯玉祥为什么倒直，是否如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粤皖直三角结盟，暗中策动的结果？是否可以说，这一政变是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

大革命前奏及组成部分？

中外史料佐证，民国军阀混战史，亦是列强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交锋史。民国肇建后，不管有无主义信仰，或以之为号召出现的所有的军事集团、政党，无一例外皆为列强所左右。早期中共高层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生活费的，那时，普通百姓月入一二元即可温饱，而中共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最高可达35元大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二）页486]。直奉战争及“北京政变”，表面看是军阀争权夺势，内里乃是英美与日本斗法。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将侵华作为国策且暗施久矣，第一步即谋夺东三省。张作霖坐大，相当程度乃日本一手炮制。故当1920年直奉战争，奉张大败后，日本对英美支持的曹锟、吴佩孚日益壮大越来越不安，尤其是曹锟竟然当上了大总统，更使日本备感危机，于是加紧策划推翻直系的北京政府。

历届北洋政府无不靠向列强举债度日，并以之应对各系军阀要挟制约，这就使洋顾问在北洋政府权重一时。上行下效，各路军阀也无不聘用洋顾问，以得信息，以购军火。这其中以日本顾问最多。半因北洋政府文武高官留日者众，半因日本顾问多为中国通，汉语极流利。不仅张作霖大帅府日本顾问扎堆儿，就是冯玉祥身边也有个松室孝良（约1885左右~1959年后）。吴佩孚私人顾问田野增次郎，则是日俄战争期间结识的朋友，也正是这位无话不谈的朋友出卖了吴佩孚。

这种关系，使日本中央军部情报工作相当厉害，他们不仅早了解奉皖粤暗结反直三角同盟，且深知孙中山为首的粤方革命军政府，没有可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是以主义为号召鼓动国民革命。故日本军头乐见粤方加入，顺水推舟并穿针引线，促成倒直三角，意在使奉皖反直披上“国民革命”的外衣，从而掩饰日本阴谋，避免英美以及国际舆论抗议其干涉中国内政。

1924年2月，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发出密报，称吴佩孚为防止直系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自立山头，压缩其军费。引起冯对吴的不满。这情报促使日本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下令中国课加紧筹划，搞出最可行方案。段祺瑞的朋友、退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游说段、张合作倒直，说策反冯玉祥可能性很大。

段曾是冯的上司，深知冯玉祥为了扩张势力“有奶便是娘”。遂立遣内弟吴光新去见张作霖，力劝张设法联络直系内可反曹、吴力量以做内应。寺西继又潜入奉天，向张作霖献计献策，大谈倒直后奉军入关益利如何巨大。嗣后，段遣与

冯玉祥有旧谊的心腹贾德耀去冯处摸底，张作霖则派其日本顾问町野武马（1875~1968）至天津日租界须磨道段宅密谋……

可以说，日本人和段、张的阴谋勾结，无形中利用了孙中山，使其卑鄙勾当披上了“革命”的外衣。

日方对冯的策反，全由土肥原贤二执行。土肥原（1881~1948）当时还是中佐，名义上是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的副官。林弥深知土肥原人脉极广，与北洋政府高官称兄道弟，不仅汉语流利，就是东北话、天津话也说得极地道。东京指令下达后，林弥命土肥原多往亲日派政客，时任教育总长的黄郛家中跑跑，意在请黄居中联络冯玉祥，不致策反冯时太突兀。殊料土肥原刚与黄接触，就收到时任曹锟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中将（1870~1950）从总统府窃取的机密情报，内容为曹锟正通过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向美国寻求援助，以固经济日绌的政府。这意味着要尽快让曹锟倒台，否则有美国撑腰，直系政权就更难颠覆了。土肥原携密件晃着柳斗脑袋上了汽车，又晃着柳斗脑袋进了黄郛私宅。一见密件，黄即估摸出土肥原几分来意了——毕竟英美与日本明争暗斗不是什么秘密。但当土肥原请其将密件副本交给冯玉祥时，黄郛还是有些吃惊和犹豫。而土肥原早把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军阀们琢磨透了，连他们谁爱吃什么菜全都门儿清，他看出了黄的心思，对黄说，冯焕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他正缺军费，请说出数目来，我们会尽快付款。

此后，夜色中，北京宣武门内象牙胡同黄郛私邸门前，会出现冯玉祥的汽车；而在北京南苑原北洋政府航空署旧址的陆军检阅使署铁门，有时也会洞开，驶进黄郛的乘车。他们密谈了什么，迄今无人知晓。但曹吴倒台后，冯黄在总统府的表演，却有明确记载。有理由相信，这“剧本”是二人合作之产物。

冯玉祥在统兵开拔前，收到了日本人的支票。这是一场肮脏的交易。但冯玉祥与黄郛间还有另一场为人不齿的交易，冯把这肮脏引入了中南海。

收买冯玉祥的倒戈巨款，明明是日方所出，但要防范其它列强窥知真相，就得像今天洗黑钱一样倒腾一番：先以张作霖向南满铁路公司贷款的名义，将此款经三井银行汇给日本驻天津司令吉冈显作；再由吉冈转交段祺瑞，再由段派亲信将一张横滨正金银行的支票交给冯的日本顾问松室孝良，最后由松室交冯。而此款的名义是张作霖付给冯的“军饷”。

这笔巨款的数目中外史料记载不一。日本铃木贞一等编《土肥原贤二秘录》（东北芙蓉书房，1972）和《续对华回忆录》（东亚同文会编，东京原书房，1972）均记为100万日元；奉系小军阀李景林（1885~1931）的参议韩玉辰在《关于李景林与国民军》中说，“张作霖扬言，冯等倒戈是官银号100多万小洋买来的”。1959年，松室对《冯玉祥传》的作者谢立丹（J·E·Sheaidan）说，冯索了300万元，但到手150万元。而在张作霖和段祺瑞间任联络员的于立言则说，段从张处拿到200万元汇票，兑得162万银元，给冯150万。

看来确数难考了。但可肯定的是，冯玉祥是在日本人的购买下，回师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的。金钱使冯有了底气，即便万一失败，也可维系冯家军不散架。然细研史料发现，冯与黄郛勾结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几百万银元，而是攫取最高权力，即扶黄登上大总统宝座。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旨号令天下了。大概这才是冯断然兵变的主因——窃国柄要比得百万大洋上算多了。

这就要说说黄郛（字膺白，1880~1936）其人其事了。他是鲁迅同乡，1905年官派留日学军事测量时，结交了蒋介石，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上海成立革命军都督府，陈其美为都督，黄任参谋长。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下令裁军，黄将其兼任的第23师和沪宁地区各路民军解散，遂得公派赴欧美考察美差。不料恰逢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黄只得自北京返沪。时人皆以为，宋死于袁手，于是讨袁成国民党的共识。但黄郛反对武力讨袁，尽管他协助陈其美在上海成立军部，且任参谋长。后来讨袁失败，黄遭袁通缉，黄与陈其美逃亡日本。陈等仍坚持讨袁，黄则先赴南洋，继赴美国转悠开眼去了。临近1915年岁末，国内反袁称帝声浪随太平洋之波猛拍美利坚的海岸。黄赶快返回上海，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道德里弄了间屋子，策划浙江独立。袁世凯鹰犬军政执法处头目陆建章（1862~1918，是冯玉祥的舅舅和提携者）、雷震春之流，残忍嗜杀号称屠夫，视上海为“乱党”（国民党）老巢，他们侦知黄郛到了上海，欲下手捕黄。黄郛赶紧避到天津。但是，还没等他弄出浙江独立的方案来，袁世凯便死了。黄居津后，宣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两年后，编撰出《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未来》、《战后之世界》等书出版。

这两本书甫出，就撞上了好运——为了不落在英美之后，法国要用巴黎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来拉拢雅好诗文的徐世昌（1855~1939），而这位中华民国的

第四任大总统却没有拿得出手的著作，黄郛因缘际会，为正急得牙疼的“文治总统”当枪手，很快鼓捣出来《欧战后之中国》一书。徐世昌挑灯夜读，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忙取出黄前出二书比照，确认是此二书删拼而成。徐深知法兰西汉学家的造诣，怕被人家看穿这书的根底，遂找来许宝珩等国学文士，往书里加了些史事典故儒学经典诸子哲言之类，俾之有些中国特色。此书以中英法三国文字印出，上署徐世昌大名，致送各国政府，又特命朱启铃为专使赴法接受博士证书。

黄郛获润笔多少，从几千到十万八万，说法不一。不管多少，黄郛借此事进入北洋政府而成高官。他学军事测量，但深谙政坛深浅。总统总理不断换，但他始终是正部级高干。到1923年任教育总长时，他结识了冯玉祥。冯时常请他去南苑为冯家军讲授军事学和欧美见闻。这种掩护，逃不过日本特工毒眼，更瞒不过冯身边的松室孝良，日本参谋本部敢于让土肥原将窃取的密件交黄郛转给冯一事说明，日本人掌握了黄冯勾结的动向。

1924年9月，冯玉祥收到松室所送的支票后，率部开拔。松室随其行动，“又参与指挥冯军作战”[坂西利八郎《在华二十余年》（1927年1月18日于大阪每日新闻社讲堂的演讲）]这大约是担心冯“拿了钱变卦”的防范之举。

冯部离京后，黄郛为其通风报信，成为冯在城内掌控局势者。直接听命于黄郛的，是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1898~1928）。他早已为冯玉祥收买。原本守卫北京城防的，是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1875~1953）的陆军十三师。偏这二流半军阀又兼着热察绥特别区巡阅使、热河都统，生怕其他小军阀占了他起家的老地盘，便抢着让十三师打头阵。冯玉祥趁机向曹锟大讲京师安全，又建议启用老部属。这孙岳在曹锟驻保定任直鲁豫巡阅使时，便是其卫队旅旅长了。所以曹立命孙悦部接管城防。

黄郛密电冯玉祥“一切就绪”后，冯命亲信鹿钟麟派出第21旅的特务营，佯作给后勤队伍送给养，随大车、骆驼队，分帮结伙陆续进城，于北城旃坛寺集中。次日午夜，第21旅集结北郊后顺利入城，首先将中南海四面包围，封锁红墙外府右街、文津街、南北长街等处；同时又派人控制了电报电话局总机机房，切断一切电路。鹿钟麟陪孙岳见中南海卫队长，这队长早和孙相识，没说几句即识时务地让部下缴械了。随后即将曹锟软禁于中南海居仁堂后的延庆楼。

直到这时，冯玉祥才和司令部一行班师回京。他们在10月22日到达京北距

小汤山不远的高丽营。没有人知道，就在这天，换上一身军装的黄郛也赶到高丽营。他再次充当枪手，连夜为冯拟写通电和五花八门的告示。23日冯部进北京时，尽人皆知冯玉祥倒戈“闹革命”逮住曹大总统，这下可有好戏看啦……

远在山海关的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听到冯部回师北京，还以为是日本人故造谣言，动摇军心呢。对左右说，冯焕章再坏，能坏到对曹三爷下手的地步吗？直到电报电话全不通，见到冯的倒戈通电，吴大帅才确信一切。立命代司令维持现状，率卫队营乘火车奔向了天津。

他想回京杀冯后再来打奉军。不料，专列刚抵天津，就看到了冯逼曹锟发出的撤职令。吴冷笑冯字如涂鸦居然也敢搞文字战，而通电斥敌又是这秀才大帅的拿手武器。遂当下挥笔立就檄文，通电全国，力斥冯玉祥劫持国家元首，伪造命令十恶不赦，接着以曹锟名义发布多道命令：罢免冯玉祥一切职务，责成吴佩孚率各省兵马讨冯；命张作霖下野赋闲，以李景林为东三省巡阅使；另委任奉张和冯部下将领为北方诸省封疆大吏……但却没启用一个吴的亲信，借以分化对手。紧接着，吴又电调各省军头北上勤王就驾……这招挺灵，川、湘、浙、苏、皖、陕、甘等等地方军阀，纷纷回电，表示将出兵讨冯。

成了众矢之的冯玉祥，与黄郛商讨对策。是月25日，对策拿出来了：一是通电“罢战求和”，二是吁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前者是挡箭牌，后者欲借孙中山大名，为其倒戈涂上革命色彩。冯深知，盗亦有道，各路军阀尊奉江湖规矩，卖主求荣，加害恩人最招鄙视。更为实际的是，当时冯家军尚难操控华北，倘若吴佩孚残部与段祺瑞的皖系联手扑向北京，必将大败。故冯又通电，请段祺瑞入京任国民军大元帅。

这时的内阁，因曹锟被囚，已经倒台走人。冯玉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0月31日宣布，黄郛以代理内阁总理身份组摄政内阁，同时兼任交通、教育两总长。过了两天，不知是黄郛要过把瘾，还是冯玉祥利令智昏，居然宣布黄郛以代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

冯黄这一幕幕表演，更招来“无法无天”等非议。曹锟虽有贿选劣迹，毕竟是“合法”总统；人虽被囚，官职仍在。于是冯又掉过头来软硬兼施逼曹辞职。为冯劝曹的是王承斌（1873~1936）。王本是曹锟任命的直隶督军兼省长、直鲁豫巡阅使副使、讨逆军副总司令，由这么一个人来劝辞，曹锟心里是什么滋味，可

以想见。而这时又发生了一件让曹锟胆寒之事——他的四弟曹锐饭后中毒身亡。曹锐掌握财权，是冯逼其交出家底，迫其服毒自杀，还是冯下毒杀之，以儆效尤？未见史料，不便断言。但曹锐之死，对曹锟的辞职肯定是一推动。但是，曹向国会递了辞呈（11月2日），却不肯交出印信。直到他的卫队和近侍全被冯弄走了，曹恐遭毒手，才交出印信。然而大总统印信，保不住黄郛的元首地位。他的内阁不仅遭到了各省军政头目的拒斥，也得不到各国政府承认。新内阁举行招待会的请柬，竟被外交使团退回。

尤令冯黄不安的是，张作霖不但提出将热河划归东北，且出尔反尔地发兵，追着溃败的直军进了山海关，两师主力正向天津逼近。

各地军政头目、社会知名人士，国内外报纸传媒，对黄郛摄行大总统职权及拼凑内阁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不知是黄郛主意，还是冯玉祥点子，为了昭示北京政变和冯家军的“革命性”，11月5日，黄郛召开国务会议，议决修改清室优待条约，决定将逊帝溥仪（1905~1967）驱出紫禁城。此事以后详说，兹不赘。

“逼宫”轰动一时，多少缓解了各方的压力。但它毕竟是场政治秀——驱末代皇帝离紫禁城，岂能彰显革命？立摄行总统入中南海，焉可掌握国柄？

此举反加重了张作霖对冯的恶感。他甫至天津即与段祺瑞研商如何对付冯玉祥。段之城府为冯所难及。前述冯曾于10月28日电邀段入京，请其任国民军大元帅，段却对此不置可否，只在回电中提出，曹锟得办正式手续下台。实借以拖时，因为“此时将自重，必待各省一致推戴，然后出山”。（《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五辑，页385）此时，段乐见冯骑虎难下，亦料定奉张必促其上台。北京政变使张作霖从不到20万人，通过收编直系队伍，扩成拥有35万人马的头号军事集团了。冯玉祥则从仅有一个师，扩编为六个师8万多人集团军，从不入流的小军阀，一跃而成二流半军阀，但仍难于奉张抗衡。若从人望看，冯像从粪坑里出来。相较下，张作霖还真有绿林之风——虽然奉军完全有实力挥师进京入主中南海，但张作霖没有；吴佩孚兵败，腹背受敌被困于津郊专列上，段请张网开一面，放吴南逃，张也同意了。

段祺瑞劝吴佩孚离津南下，半是避免天津开战引来多国干涉（因天津是港口，列强利益多在）；半是暗阻奉张独大——留吴佩孚可集旧部对之制衡，防其日后左右北京政府。段是围棋高手，他将“作眼”的功夫用在了政治上。

吴佩孚就是不肯离津，声称俟援兵来后与冯玉祥拼个你死我活以报仇雪恨。直到获知京汉、津浦铁路被炸，孙传芳、齐燮元所部难以北上之后，吴才同意离天津远点儿，去了塘沽。

1924年11月10日，冯玉祥正要赴天津见段祺瑞时，孙中山发布“北上宣言”。这让冯进退维谷。他前时吁请孙北上，不过是阻奉张入关的一张牌。现在奉军非但入了关，还有扩大之势。孙中山就是来到北京，奉军既不会退回关外，冯家军也再难操控北京政府。

冯玉祥本以为请段出山，段会投桃报李。孰料段事事站在张作霖一边儿。据说冯至天津，在赴段的宴会前剃胡子，有人说，将军得有八字胡方显气派，冯便来了一句“胡子不能要，非去掉不可。”这话传到张作霖耳中，更加重了对冯的恶感。这也许只是小说家言，却与张、冯二人的性格相符——张最忌讳人说他是胡子出身，而冯一向喜欢搞些挖苦讥讽别人的“行为艺术”，诸如见人衣着华奢便上前施礼，对方劝阻说不敢当，他竟说我是冲你这皮鞋鞠躬呢。

总之，冯在“天津会议”中，没捞着什么便宜，自始至终为张作霖冷淡漠视。在张眼中，冯是个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小人。想当初，冯受吴佩孚压制，在河南受排挤争不到地盘，备厚礼至保定，一见曹锟便扑地大哭。曹劝慰，冯竟说玉祥在外受了委屈，见到大帅就像见了亲爹，怎能不哭云云。在曹锟的保荐下，冯当上陆军巡阅使，带着他起家的一帅人马开到北京南苑。

这些事广为人知，所以张作霖觉得冯太虚伪了，不可交。当冯重提奉军不入关是张的承诺时，张驳斥说，有何凭据，你也知道信守承诺？！最后直言，奉军不光入华北，还要下中原平江南，扫灭直系。冯在会议桌前打起了小九九：这场政变算是给别人做了菜。段老谋深算，若不依他们达成协议，不仅无法为这场政变收场，还有可能离不开天津，这土匪巨枭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天津会议议决的几条是：奉军进至德州为限，不再对东南用兵；吴佩孚和平下野，不对其下通缉令；国民军可沿京汉线向南发展；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这些条款表面对冯妥协，其实可让段祺瑞左右沾光，利用直奉相互制衡。

几天后，即11月15日又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孙岳、胡景翼联名通电拥段祺瑞为中华民国元首。但弄出个新称“执政”，而不叫大总统了。是谁琢磨出来的，查不出，或许由“摄政”衍化而来，也未可知。

1924年11月15日前后，滞留塘沽的吴佩孚等一行，登上接他南去的华甲号军舰。北望山海关，吴不禁潸然泪下。20万大军居然为冯玉祥这么个小人葬送了，怀抱着这奇耻大辱，他断言，冯某不会善终。

11月21日，段祺瑞再发通电，即民国史上有名的“马电”。次日下午两点多，段乘专车抵北京前门火车站。黄郛并全体内阁成员及地方官员迎接。随后，段乘汽车驶向其东城吉兆胡同官邸。第二天，黄郛专程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一大一小两方铜印，毕恭毕敬地送到段祺瑞手中。黄深知这老段行政如下棋，鬼点子多如围棋子；若无印玺送上，人家断不会到任。而段不到任，他和冯玉祥就难收场。

11月24日上午十时，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原陆军部旧址临时执政府大楼，举行就职典礼仪式之后，段即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六条，头一条即“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其他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公报》第3115号）将总理、总统、军队等所有大权集于一身了，俨然当年袁世凯。段在当时确孚众望，各路军阀皆拥戴其复出主政，但段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皖系集团已经土崩瓦解，请其出山，奉张意欲树其帜而号令天下，直冯则是欲借其名以摆脱发动政变后的困境，并牟“合法”利益之分配。

11月25日，段祺瑞任命唐绍仪、吴光新等任各部总长。此前早辞去本兼各职并尽心尽力当了回“护印专使”的黄郛，本以为段好歹会赏他个职位，殊料段全不领情，不闻不问。黄郛只好灰溜溜移居天津当寓公去了。

至此，冯黄北京政变同盟算是走到尽头，多年后，冯在《纪念黄膺白先生》中道出点实情，说黄郛对政变“筹划策维，其力实多”。（《黄膺白先生故旧感怀录》页40）冯是将倒戈兵变视作“首都革命”方吐此言的，或许他以为收受日本人巨金事，不会大白于天下罢。但历史毕竟不可能永远为所谓“胜利者”书写。史实定格于历史时空，你可以遮掩，但无法抹掉。

却说段祺瑞上台伊始，即将冯玉祥部属将领孙岳等，不是任为督办、剿匪司令，就是任为都统，成为各领一方大吏，独独任冯为“西北屯垦督办”，打发他去穷乡僻壤凉快去了。这任命十之有九是张作霖的主意，但以“国家元首”作为政令发布。冯玉祥愤懑之极，却又不能对抗，也没资本对抗：部将全拉走队伍升官发财去了。冯这才悟出来，费尽心机搞的政变不过是自己绕着中南海走了个圆。

他于次日上辞呈并通电请假养痾。整整闹腾了一个来月，大名远播中外的冯玉祥，蒸发般突然消失了。当时人们不清楚他去了哪里，1949年后为冯唱颂歌者，似也不愿寻找其足迹。那时的新闻热点是孙中山北上，当时也没有哪家报社有今日狗仔队的胆量，成天盯着“军政明星”，毕竟按快门干不过扣枪机的。

冯玉祥在变相通电下野时，已与卫队团和家眷秘书等，潜伏京西无太（台）山慈善寺隐居了。此地在北京石景山区八大处西北十余里处，寺在主峰西侧，是有殿舍百余间大寺。寺下是潭峪树，落差二百米，是个三面环山，俯视川谷，易守难攻，地势极险要，山大王宜居之地。有理由相信，冯隐居于此，半是抗议段祺瑞，半是避免和孙中山会面。他确陷“猪八戒照镜子”窘境。政变轰动中外，使他从一个没名气不入流的小军阀，一跃跻身张作霖、吴佩孚之列。但“倒戈将军”这将军帽，终归不好看。好在那时日本人和奉张、皖段出于各自利益，对冯玉祥收日本人巨款一事只字不泄，否则，冯的政治寿命不会延续到四十年代。

冯的仇敌吴佩孚，好像也未掌握这情况。1984年才问世的《吴佩孚致冯玉祥书》（刊于《文史资料选编》第22辑，第37~39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版）长达两千余言，写于1924年11月17日。吴佩孚以其秀才大帅犀利笔锋，将冯剥得体无完肤。如“唯此次足下所为，失信曹锟，是为不忠；遗憾袍泽，是为不信；留玷教会，是为不仁；遗恨国人，是为不义”；如“阴险之名已千古不磨矣”等，皆锋利入骨，但却无只字谈及冯玉祥为日本人购买事。

冯玉祥在慈善寺前后山留下的六处摩崖刻石，揭示了当时他内心世界。其中最大者十几平米，上刻《易经·谦卦》之卦辞、象辞、六爻全文，共209字。这下艮上坤的“谦卦”有点卦识人皆知，坤为地，艮为山，意为高山让土埋住了，白话即“虎落平阳为犬欺”。是在借易经骂政敌。也是以之宣泄名声扫地，前途堪忧时的心情。此外，谦卦六爻皆吉，亦揭示冯自我祝福，希冀否极泰来。冯还借练字写条幅如“谦谦君子，高揖群公，急流勇退”、“忍片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排解忧虑，平衡心理。

但后来历史证明，冯从未急流勇退去当谦谦君子，而是始终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一样的以血火刀兵争权夺势者。抗战初期，他被任为第三战区司令时，因接连三次企图暗杀政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上将总参议萧振瀛（1888~1947），致蒋介石撤销该战区编制，变相罢其职，给了个军委会副委员长

虚职，这才彻底削其兵权（萧振瀛《华北危局纪实》页68，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自此冯从拥兵反蒋之军阀，变为无兵骂蒋之名人了。

这按下不表，且说孙中山11月13日自广州启程北上，17日抵上海。因军阀混战江浙而无法陆行至天津，只好赴日本。当其11月30日乘北岭丸自神户至天津时，已是12月4日。身心俱疲，使他肝病复发，只好在天津治疗。12月初即统奉军离京至津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孙中山抵津次日即去探视。但首先通电请孙北上“主持大计”的冯玉祥，却不声不响，管自在天太山看着保卫他的“和尚兵”们换岗，看着从城里送来的报纸。（案：当地老人说，冯命士兵换和尚衣站岗放哨）段祺瑞则明知孙北上途中发表的政治主张与其针锋相对，但也不能不表示欢迎孙早日进京，派叶恭绰、林长民（林徽因父亲）赴津接迎。

从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自津来京，到1925年3月12日病逝，冯玉祥自始至终没有露面。唯一表示，是在1月6日让其秘书包世杰（1891~1938）以其名义，在前门火车站西站食堂宴请孙中山全体随员。孙中山派汪精卫为代表答谢，汪因从未见过冯，便约孔祥熙随包去天太山见冯（包世杰《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近代史资料》71，中国社科，1988）。

而在此前两天，即1月4日，段祺瑞明令发表改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派员至天太山，劝奉“销假视事，以息留言”。八年前，冯擅自扩团为旅，段令裁军时，冯即阴策官兵跪哭满营，段不买账，严告将视哗变予以消灭，冯才收场，旋称病辞职，跑到天太山和尚庙去了。故值孙中山来京之际，段实担心冯会搞出什么“行为艺术”来令人难堪，所以才打发冯离京。冯见有了不大不小带兵权，便于1月13日带其一班人去张家口，准备吃口蘑菇炖肉过大年去了。

冯自1924年11月25日至1925年1月13日居天太山，始终不见就在北京饭店的孙中山，加上倒戈兵变后，先将贿选总统赶出中南海，继把末代皇帝撵出紫禁城，搅和得北京城似大戏台。四九城的人们也因此有了谈资，相关传说也就越来越邪乎，甚至流传，冯曾在夜里戒严，从皇宫拉走十几辆大卡车（也有说骆驼的）宝贝。这些“流言”既使冯愈发为人所鄙，也令段祺瑞感到早天将冯请出北京，早天省心。所以改了任命。

但冯虽离京，他制造的麻烦仍在，且遗下祸根。“逼宫”事件为最。

把废帝溥仪驱出皇宫，是在1924年11月5日黄郛召开所谓国务会议上的决

定，且于当日即付实施。由冯玉祥心腹鹿钟麟（1883~1966，时刚晋为第一师师长兼京畿警备司令）、京师警察总监张壁（后成为汉奸）带队伍进攻执行。先将清宫守卫警察缴械，又命护军统领毓逖下令集中文武官兵于一处，继命内务府大臣绍英、荣源，向溥仪转达摄政内阁总统令：废帝号，立刻迁出皇宫，以两小时为限，过时即由景山开炮，武力驱逐。住在养心殿的溥仪赶快以清室内务府名义致摄政内阁复文，谓“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清帝谅解，一切奉谕照办”。同时交出“皇帝之宝”、“宣统之宝”两方印玺。当日下午，溥仪及后、妃亲属等被送到后海北沿醇王府，即溥仪父亲载沣家中安顿下来。次日，黄郛即发出通电，通告中外，又下令北京全城挂国旗以示庄贺。这自然是借民意之政客把戏（鹿钟麟《驱溥仪出宫始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四辑，页94-129，天津人民，1979）。

事先对“逼宫”全不知情的张作霖和段祺瑞，一度想联手起兵讨冯，后见社会舆论颇有些人支持此举，谓之“彻底革命”云云，加上孙中山将北上，遂作罢。段、张皆通电质诘冯，冯对报界的回答则是“此次班师回京，并无何多贡献，惟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驱逐溥仪出宫，尚可告无愧于天下后世”。

冯玉祥“逼宫”，为军阀胡作非为开极恶先例。几年后，军阀孙殿英（1884~1947）身为第六集团军第25军军长，闻要裁军断粮饷，便悍然以军演为名，炸开清东陵地宫，盗走大量珍宝。事后，当冯见到孙时，竟半开玩笑地说，老弟，我在地上革命，你在地下革命。这自令人思索，那些流言恐怕未必都是空穴来风。孙殿英盗皇陵，是否受“冯氏革命法”启迪并予创新，从地上革到地下，还真难说。

有些事往往要历时间检验，方可见利害。当时，赞同拥护驱逐溥仪出宫的政坛名人大老不少，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向与冯不相投，这时居然电贺冯玉祥。继章后，又有文化教育界人士250人联署宣言为冯喝采。周作人致胡适长信，说清室既曾复辟，因此冯部所为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周还以为，“民国留此祸根，实属危险”。周自然不会想到，13年后，他在北平当上日伪政权高官，无异于成“祸根”之须矣。历史何其吊诡叵测，令人叹息。

在诺诺声中，独发愕愕语者，弥足令人钦敬。溥仪被逐，胡适持反对态度，致函内阁阁员外交部长代总理王正廷（1882~1961）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优待条件，乃国际间之信义，有条约性质，条约是可以修正或废止的，但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其实中国之祸根多多。其一即社会观念国民思想意识浅陋，看标不看本，误将“革命秀”当成革命，遂让冯氏之流打着种种主义加上革命旗帜招摇，荼毒华夏。时有北大同仁李书华、李宗侗二人，认为“皇帝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雄赳赳气昂昂致书胡适大加质诘。胡适平心静气复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以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此言何精警，说在八九十年前，岂非如对今日！可惜，胡适的普世性看法，迄今未成国人共识。

就在社会热议“逼宫”话题时，1924年11月29日，溥仪在一班帝制余孽郑孝胥、陈宝琛、罗振玉等热衷权势之徒策划下，以治病为由出走，先是住进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继在日本驻华公使方泽谦吉亲自安排下，转入日本公使馆，直住到1925年2月23日，又潜伏天津。这正是孙中山先生重病时期。

此后日本军阀侵华史证明，中国军阀混战，冯玉祥之流制造的种种“革命业绩”，适为日本利用，精心策划出蚕食中国方案。几年后，日本军头先炸死张作霖，随即将溥仪弄到东北，扶植其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使我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白山黑水之域，成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基地……这一痛史，倘若追根溯源，说冯玉祥拿日本人百万大洋，无形中为日本侵华做了个“眼”，大概不为过罢！

至此，可得出结论：冯玉祥、黄郛所搞所谓“首都革命”，实质上是小军阀小政客相互利用，妄图通过倒戈兵变攫取国柄，跻身大军阀大政客之列的一场闹剧，且因得到日本军阀势力金钱资助，从一开始即为其利用并纳入了日本侵华阴谋。可以说，“北京政变”既是中国军阀混战史之别裁，又是日本侵华史之一页。长期以来，史家尽依冯玉祥《我的生活》述史，以“基督将军”“倒戈将军”“骂蒋将军”来概括冯氏一生。而历史本面则是，冯借革命之名固其军阀之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其毕生之座右铭。其唯一“革命行动”，就是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下令“清党”，他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杀共产党人，而是将在其所部搞政工的宣侠父、邓西贤（邓小平）等集中于开封，吃罢饭赠银元，礼送出境。

“爱国将军”“基督将军”之美誉，来自中共。❏

【百年国史】

画说我的一生 (22)

——手足离散 (1965—1976)

刘海鸥



1968 年, 社会仍然处于震荡和混乱之中。大学不招生, 工厂不招工, 中学生无处可去, 小学生无法升学, 中学六个年级的学生几百万人成为社会上极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毛泽东英明决定把这些人全都放到农村, 他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于是旋风般地, 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所有中学生(即老三届)都被刮到了农村。上山下乡也分几个等次, 出身好的到兵团, 出身不好的去农村插队。

刘元最先去农村插队, 文革开始她上初二, 插队时也就 17 岁。学校有东北建设兵团的人来招生, 她的出身不合格, 努力争取也捞不上名额, 哭了一场, 只好去了内蒙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插队。

刘元是8月份走的，爸爸还有我和克阳去送行。公共汽车把一车车塞得密密实实的人倾泻在北京火车站。很多人是全家来送行，同学朋友们也都来了。站台上人山人海，红旗，锣鼓，喇叭，还有人们的叮嘱道别。很多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年轻人则是眼睛红红的。一个男青年抱着小外甥（旁边哭泣的年轻妇女大概是她的姐姐，孩子的妈妈），眼睛里含着泪，强忍不让落下，这一场面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直至今今天还历历在目。也有一些人高兴地说笑，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们三人都很平静，刘元还在笑着。



火车终于长鸣一声缓缓启动，就在火车“咣当”一声前进的一霎那，站台上所有手臂同时举起，像突然冒出的一片树林。本来说笑的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车上车下同声爆发一片哭喊。那情景一千二百年前杜甫就已经做了精准的描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12月份，“老高二”的克阳也去了山西原平插队。她不久前才刚刚胃溃疡大出血，已经是第二次犯病了，妈妈带着她到学校请求免于下乡，遭到半个屁股坐在桌子上的军代表无情拒绝。我们一家人都很老实，没有一句争辩的话便帮着克阳收拾行装。四年后，她还是因为这个病退回北京。

我给克阳带的奇豆腐被我一人吃光了。



1971年的暑假，我去山西原平县看望插队的克阳。先到太原，在克阳介绍的一个插队生的表姐家落脚。那人是山西省话剧团的演员，很热情地给我做了一顿挂

面，告我去村里的详细路线。她家里总是聚集着一堆演员聊天打扑克，文革中没有话剧可演，那些没兴趣打派仗的就剩这一个乐子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自制的扑克牌，那年月扑克是四旧，买不到，搞舞美的就自己做。扑克是用X光胶片作的，在一面画上花纹，另一面画牌号，画工精巧别出心裁，尤其是“国王王后和王子”还有“大鬼小鬼”，均造型奇妙，色彩鲜艳，勾勒精细，真是一副扑克牌的珍品。中国人的才智无论遭到如何的挤压总是可以找到展示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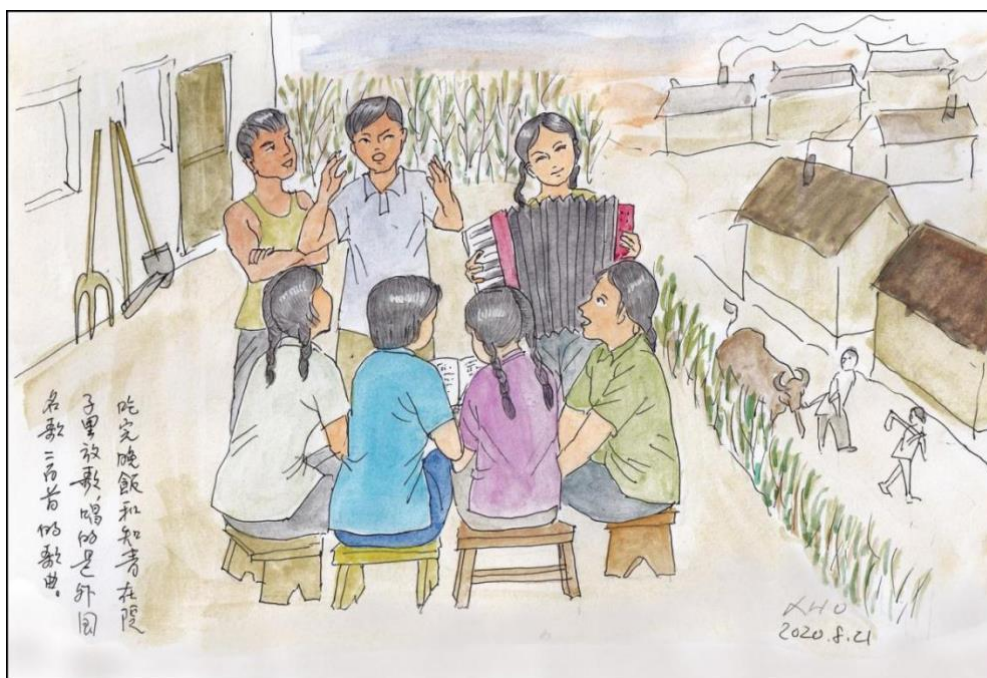
克阳曾说过她们那里一天三顿窝头，没有菜，偶然有就是韭菜，用盐水煮，没有油。连酱油都买不到，插队生从北京带回去“酱油块”（固体酱油），老乡稀罕得不得了，每次插队生回京，都要替老乡大量购买。去看克阳之前，我买了一罐酱豆腐，一些点心，一些糖果，还学着阿巧做烧鸭的办法做了一只烧鸭带给她。

知青住在村里为他们盖起的知青点里，一排土砖房前面一块院坝，还算干净整洁。他们的伙食的确太糟糕，一天三顿咽窝头。带去的酱豆腐，名义上是给克阳的，可我吃一个窝头就三块都不够，短短几天时间，一罐酱豆腐就叫我吃光了。

克阳带我去看了村里相处得好的乡村青年，去了一家打杏子吃，给他家几分钱，杏子随便打。我们还去看了水库，田地，给她和知青们照张相。她给我讲村里人们的故事，都非常有趣，三十多年后，她把这些人和事写成文章，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农村世情。



一天我和克阳到村里转转。回来的时候发现一条狗进了屋子，把我带给克阳的奶油糖全部吃光。那些糖克阳本来细心地藏在枕头底下，准备一天吃一块，可以吃一个月的。可怜的妹妹竟然为了这点糖哭了一场。



原平县在平原地带，生活水平比山区强一些，这里的插队生的情绪还算乐观稳定。晚上我和知青们坐在院子里唱歌，一个知青把珍藏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及《续编》拿出来，一个女知青拉手风琴，大家拉开嗓子唱苏俄歌曲。周围点上编成绳子的干艾蒿驱赶蚊子，弥漫的雾霭与村庄中的袅袅炊烟混合在一起，恍惚

间生出一种静谧田园的感觉。



离开村子时克阳把我送到太原，我们一起参观了依然保留完好的晋祠。晚上我们在火车站分手，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准备去干校探望父母。分别的那个时刻，看着克阳在黑暗中隐去的孤独身影，想到一家人天各一方，不由黯然神伤。

1972年，克阳因为胃溃疡加剧病退回了北京。



1973年夏天我去安徽老家看望在那里插队的刘元，她原来在内蒙插队，听说老家淮北要建一个大煤矿，需要很多工人，就从内蒙迁到老家插队，希望招工时

能分一杯羹。安徽是全国贫困省份之一，而淮河以北又是安徽最贫困的地区，我的老家就在淮北的濉溪县临涣集。刘元一个人住在跟亲戚借来的房子里，屋子里除了一张竹床，一把细柴禾和地上一堆老玉米口粮，几乎什么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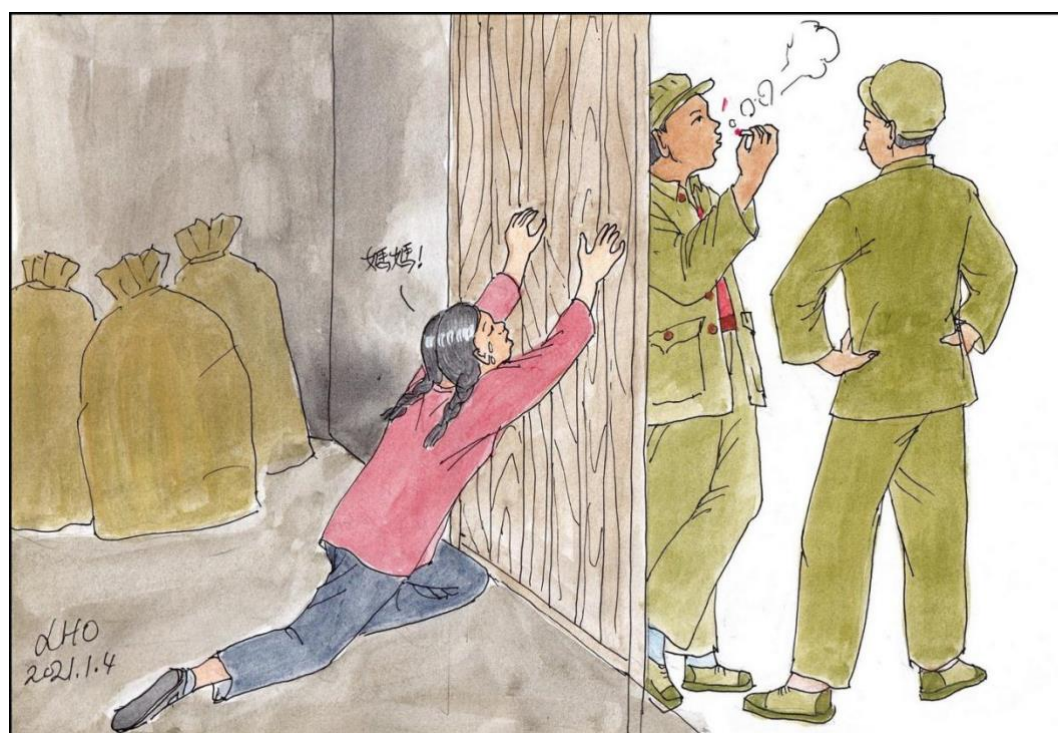


生产队分给她的那点细柴禾，几把火就烧完。没有柴禾，吃饭洗涮都成了问题。趁政府挖坟头扩大耕地的政令实施，刘元把出土的棺材板子一条条拖回家，晾干当柴烧。她的举动吓坏了老乡，甚至从此没人敢和她来往。



刘元带我去看了一些刘家的亲戚，更穷，床就是一个木框子上面缠绕一些绳子，没有被褥，只有一堆看不出形状的破铺陈。拴在墙上的绳子上搭着几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就是全家的家当。只知道我所在的永丰屯穷，出来一看还有更穷的地方，而我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在这里我只有无望的感觉，真替刘元难受。

在家乡插队一年多，当矿工政审不合格，刘元只好又回到内蒙莫旗插队。直到1976年才办了假“病退”回到北京。



最让家人操心的是海燕。她1965年自愿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现实和她理想主义的世界相差太远，她的简单，直率，任性及火爆脾气让她在兵团这个封闭专制的小社会里，吃尽了苦头。她被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身，间谍交通员（这是最主要的罪名，只因她和一个被定罪为“法国间谍”的女孩从小学就是好朋友，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有时间另说），与少数民族交往（有叛国投敌的嫌疑）……再加上妈妈的“叛徒”问题。她七年来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在兵团受尽折磨凌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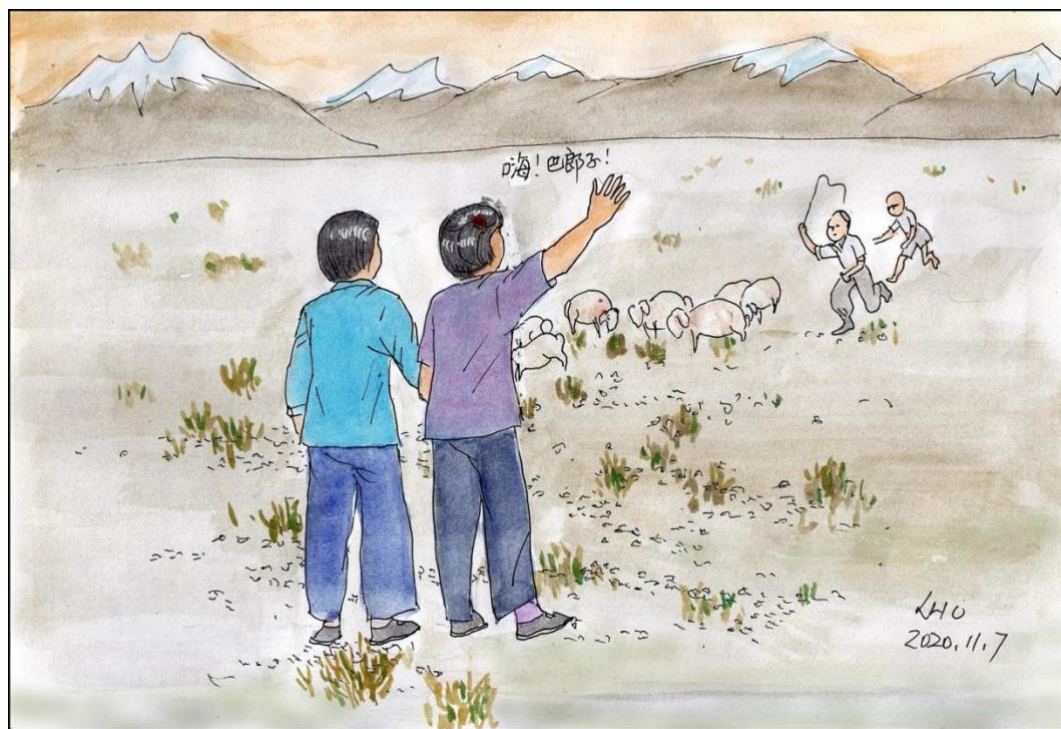
1972年我收到了海燕一封信，信中说她因为被连队干部打击报复而关了禁闭，她被粗暴地拧着胳膊，扔进一间小黑屋。

她在黑暗中她扑向门口，撕心裂肺地喊出了人类的最强音：“妈妈”。

看到这里我的心都撕碎了，夜里我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我感觉她的精神已经

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分担心，立刻和爸爸妈妈商量，我要去新疆，去解救她于水火之中。

以前我就想过去看海燕，但是妈妈不同意，不愿意让人家觉得海燕“特殊化”，寄希望于海燕自己在兵团好好劳动改造自己。看了我转去的海燕的信，爸爸妈妈再也不说“不要去”了。



1972年的暑期，我和刘元踏上了去新疆的列车。四天五夜后到达乌鲁木齐，我们找到姨父介绍的军区的一个领导，开了“边境证”。海燕的连队在伊犁地区，靠近国界，到那里必须持边境证。

给海燕打了电报，告知我们即将到来，然后坐上长途公共汽车向伊宁进发。

汽车走了几天，在记忆中已经模糊。只记得到达伊宁前的最后一站是在五台住宿。那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安排好住处，我和刘元出来转，五台这个地方，除了一些黄土房子，再也没可以入眼的东西。旅店后面就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远处是天山山脉，空旷寂寥。想着这就是海燕生活的地方，心里揪成一团地难受。唯一有点生气的地方是旅店对面的饭馆。时间还早，饭馆还没开门。我们两个还像在外地串连时一样无所顾忌，一头钻进饭馆的厨房，见一口巨大的铁锅里炖着满满一锅红烧羊腔骨，香气扑鼻。大师傅说，刚下锅，再等等吧。饭馆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上面满载着大蒜辫子，一些蒜辫从车帮上吊下。那蒜头之大，我头一次见到，几乎有我的拳头大小。我和刘元一人扯了一头大蒜，准备着一会儿就

羊腔骨吃。终于等到饭馆开门，我们迫不及待地一人买了一大碗羊骨头，就着大蒜吃得香喷喷的。新疆的羊肉比起内地的来，又鲜又嫩，还不腥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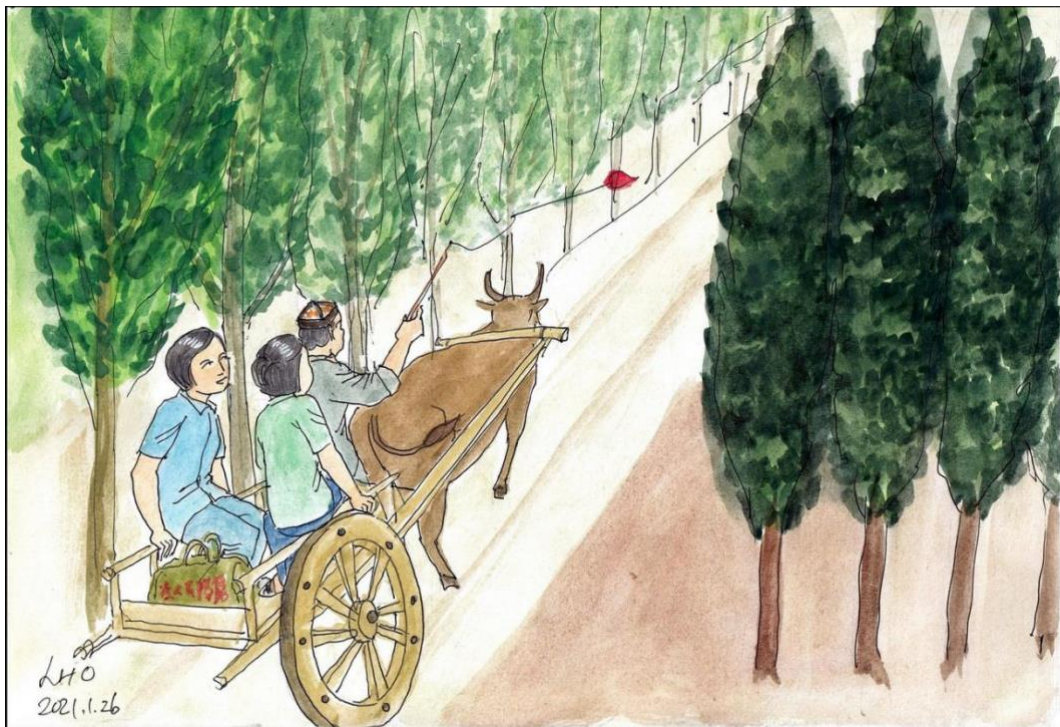
吃完晚饭天色还早，我们俩到戈壁滩上散步。因为眼前辽阔，我们不由得放声嚎歌，远处几个维族小孩赶着羊群穿过戈壁滩，穿着布袋似的宽大裤子，戴着维族小帽。我们冲他们吆喝：“嗨，巴郎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假装说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叽里咕噜回答着什么，然后撒开腿嬉笑追赶着羊群跑掉了。我和刘元也哈哈大笑，这时候，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一个多月后刘元一个人回京，又在这里住宿，面对漫漫戈壁滩，想起了羁留此地的海燕，她流下眼泪。



我们入住的旅店，和在古装武打片里看到的大车店毫无二致（就是院中没有拴马桩和马厩而已）——一个黄土大院子，三面各一溜干打垒的土房。我们登记了两个床位，屋子里除了几张脏兮兮的床和被褥外什么也没有，同住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妇女。

夜晚，旅店的房间里闷热极了，我发现好多人都睡在外面的院子里，于是我们抱着被子，扯着褥子，也到外面席地而卧。院子里陌生的男男女女人挨人地躺了一地，我第一次体验这种局面。这一宿虽然凉快，但蚊虫骚扰了一夜。



到了伊宁，海燕没有像在信里所说的在伊宁接我们。她没有收到电报，电报在我们到达后几天才到了海燕所在的农四师谊群农场园林队。好在找到了海燕的好朋友季晓峰，她带我们在兵团招待所住了一晚上。

我们决定自己去园林队，次日一大早就坐了一辆木轮牛车出发了。一路上风景明媚，远处有层层起伏的山坡，坡上的松树因地势而一排排高低交错，路旁耸入云天的白杨把道路引向远方。我不断地想起俄罗斯度假画派的风景画和《小路》这首歌曲。我明白了海燕为什么如此热爱伊犁。

可是我们坐的车却不舒服，木轮牛车是新疆农村广泛使用的运输工具，坐上去才知道是那么受罪，木轮上只有一层胶皮，毫无弹性，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人都快颠碎了，而且车子又走得极慢。

到了园林队，马上就见到海燕的期盼又一次破灭，她不在。没人知道这个休息日她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失望可以想见。她就是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被整得七荤八素，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领导的限制（不允许她随意离队，除非经过层层批准）放在眼里。直到第二天海燕才回来，她去附近公社的朋友家了，见到我们大哭，恨自己把珍贵的暂短的姐妹会面白白丢掉了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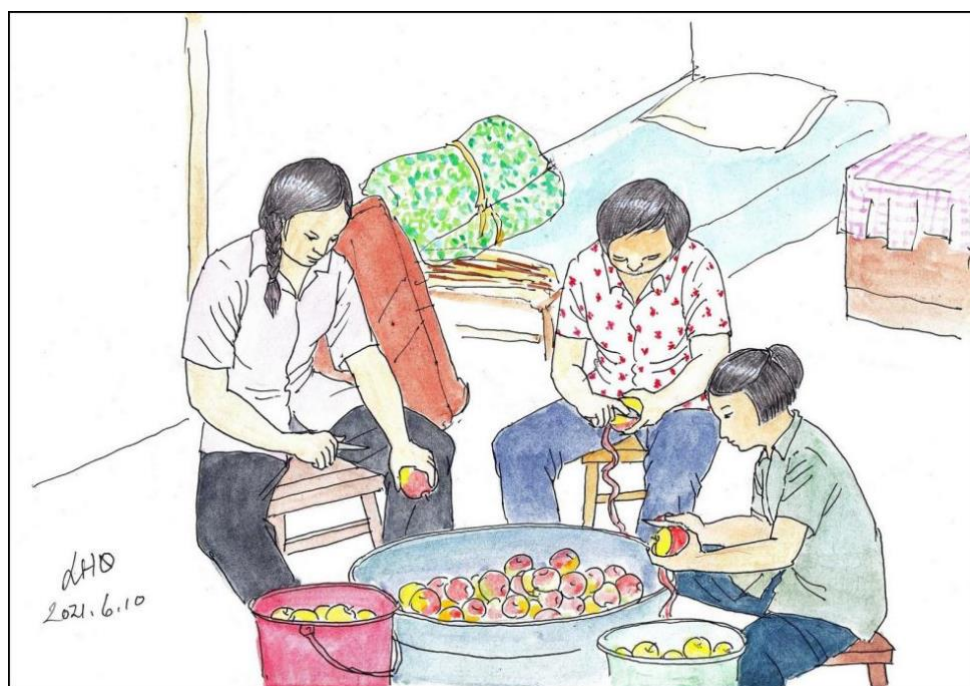


海燕住的房子在一排干打垒土房宿舍的尽头，和她同住的是江国莲，这会儿回家探亲去了。江国莲有精神病，很多人把海燕也当成“半疯”，而领导带有整蛊性地把“疯子们”放在一起住。屋里甚至连电灯的开关都不给安，与隔壁的宿舍共用一个，只能被动地等待隔壁开灯或关灯。

环视海燕的生活空间，小小的，两张床，是芦苇把做成的，上面铺了两层毛毡。被子卷成一团缩在墙角里。床也是“办公桌”。墙上镜框中装着一幅十九世纪俄罗斯森林和田野的著名油画（记不住是哪位画家的了。那是她离开北京时，悄悄从爸爸的“特列甲阔夫画廊藏画”的大画册中拿走的）。窗台上躺着吉他琴盒，琴盒上排列着三支木盒，分别装着笔记本、练习本、信纸、报纸。琴盒上叠放着两摞裱糊着封面书脊的旧书，那是海燕收集来的小说、文艺论集。因为传过无数的手，散了架，经过海燕的细心裱糊变得整整齐齐。床边的箱子搭成“桌子”，一边放着书，一边是放零七八碎的小木盒，中间是一个巧克力糖铁盒，装着针线。房屋的空间虽小，东西摆放十分整齐，一尘不染。这哪里是一个被整得七荤八素的“半疯”人的住处？海燕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日子多么不堪，绝不容许乱七八糟得过且过。

晚上我用海燕的小煤油炉给她做晚饭。海燕从小就不会做饭，在兵团一年到头吃着食堂粗制滥造的饭菜，实在馋了就买个罐头和面糊糊一起煮煮吃。她老想

吃以前我们在“和平餐厅”、“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吃过的奶油番茄汤。我土法上马，用西红柿煮汤，加上牛奶和面粉做了一个类似的糊糊汤。这汤做得实在土，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上海姑娘季晓峰浅尝一口就放下了，那汤怎么能和上海“红房子”的相比呢。海燕吃得特别香，“就是这味！”喝得精光。她还让我用鸡蛋炒当地的柿子椒，柿子椒皮薄薄的，是辣的，炒出来的鸡蛋特别好吃，我没想到炒鸡蛋也可以是辣的。



园林队到处是大片大片的果园。到园林队的当天我和刘元就参加了摘苹果的劳动，为的是给农场的群众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累点倒没什么，对海燕有利就行。苹果园有诸多品种的苹果，酸的甜的，汁多味美，海燕摘下各种苹果让我们品尝。有一种苹果长到后来就变成半透明状了，果汁浓缩，味道醇厚，蜜一样甜，海燕说那叫“油果子”。她最喜欢这种苹果，不断地摘来让我吃。

海燕跟园林队买了一大筐苹果，我们一起削皮切片晾果干，等刘元回去的时候（我只有十二天假，刘元还要多呆一个月陪陪海燕）果干应该晾好了。海燕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我们和爸妈，所有的心意都寄托在苹果干上。那次关禁闭就是因为给我们晾晒的果干被连长的孩子偷去了大半，她去连长家理论，惹怒了连长，遭到报复，关了三天黑屋，是连队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罚。



这次新疆之行，我的使命就是改变海燕在各层领导眼中的形象，争取让她享受回京的探亲假，甚至脱离兵团。

我深深地了解海燕的为人，她没有什么不好，最多就是自命清高，自由主义，还得理不让人而已。但就是这点小个性也不为刻板的领导和制度所容。她被强加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和五类分子同等待遇。

海燕给我提供了从班长排长连长连指导员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治处主任参谋长一系列领导的姓名人品性格和联系方法。第二天，刘元和海燕去干活，我就开始找领导谈话。

从班长排长连长……层层往上，直谈到师长，同时还有各级领导中管“政治思想”的教导员政委之类，最后一个师政治部主任。他正在住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找到病房里，搬个椅子坐在床边滔滔不绝。所谈内容基本一致——海燕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从小热爱党和毛，响应号召自愿到新疆……加以无数优点事例。然后指出她的缺点——自由主义，根源是外国书读多了缺乏分析能力……总之给她定了调子，好人犯错误。我的要求非常简单合理——给她一个探亲假，她已经七年没有享受过国家职工年年都享受的探亲假了。整个谈话我运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为武器条分缕析，听得那些干部们五迷三道。后来师政委曾对海燕赞赏道：“你妹妹政治水平非常高。”我确信以我的水平，如果

在兵团大概已经被调到师政治部工作了。

让人高兴的是师政治部主任明确表示海燕的问题是思想问题，属于帮助的范围。几天的谈话，基本达到了来疆的目的。至于让海燕探亲的要求，他们说会再讨论安排的。

顺便说一下，在访问各级领导时全都送了礼。礼品不重，不外是一盒果脯，或一瓶二锅头，那年头还不像如今非金钱重礼开路办不成事。那一点礼品只是为了制造一个谈话的好气氛，而各级领导拿到礼品竟是受宠若惊的样子。



其余的时间就是和海燕一起劳动，替海燕“联系群众”了。

海燕在兵团除了和少数支边青年谈得到一起，多数群众在她眼里都属于“精神世界匮乏”一类的俗人，海燕对这些人的态度真是很过分，不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为了阻止他们来串门，耽误她看书写字的时间，在门上贴了鲁迅的话：“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在群众眼中，海燕毫无疑问是个妄自尊大的狂徒，简直就是个怪物，最好躲她远远的。失去了她周围环境下的群众基础，海燕在遭难时处境就更加险恶了，很多人都在看笑话，甚至落井下石。

其实海燕内心善良正直，比如对待同宿舍的江国莲，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江

国莲是神经病人而侮辱她欺负她戏弄她，海燕极为痛恨这样践踏人性，她若见到别人欺负江国莲，就会愤怒地瞪起眼睛，脸涨得通红，说话声音都变了调：“你们凭什么欺负人家？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在江国莲犯病时，海燕给她梳头，打饭，洗沾着尿尿的衣裤。她两次为了保护江国莲不受欺侮和其他农工大打出手，结果更招来别人的攻击和记恨，还被开了批判会。

为了替海燕挽回“群众影响”，我和刘元在园林队作出亲善大使的模样。刘元这个人十分平易，不论在哪里都能和人说到一起。而我在对“群众”的看法上骨子里和海燕很相近，我们的不同在于，我正在努力用“阶级观点”划分人群，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感情移到工农阶级上来。我和园林队的农工的确无话可说，但是为了海燕，没话也要找话。我还有一个极大的毛病——记不住人脸。已经说过好几次话，打过好几次招呼，就是记不住，下次再见时，还是陌生人一个。我们一到园林队，好多人跑来寒暄看热闹，为了下一次见到这些人能认出来打招呼，我努力地记忆他们的特征，面孔记不住，就记穿戴。有一个人穿了一双红布鞋，还有一个人穿着一双黄袜子，于是见到红鞋就打招呼，见到黄袜子就露笑脸。好在那时人们没有那么多衣服鞋袜可换。

我和刘元的努力多少见了一些效果，海燕在人们眼中的印象多少改变了一些。



海燕最崇拜和最知心的朋友莫过于老周夫妇，嘴上整天挂着他们的名字。我们初到伊犁等待海燕的那两天，她就是去天山公社访问老周夫妇了。

我很想见识一下这对夫妇，究竟是什么让海燕这么着迷。一天下工她带我们去老周家。这是一个农家小院，院子里黍菽椒豆长得热热闹闹。老周夫妇都在家，招待我们吃饭，非常热情。他们的确谈吐不俗，虽然是农民身份，却是两个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周大姐，嗜书如命，家中不乏西方古典名著，海燕和她颇有子期伯牙知遇之感。

但是我不知如何对此二人作出界定，我感觉很不安，因为他们完全游离于社会潮流之外。老周原来是西藏军区的干部，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又辞职不干，离开家乡成都跑到边疆来。老周本来干着大队会计的工作，有“贪污公款”的问题。奇怪的是所谓的“贪污”，不是把钱揣在自己的腰包里，而是慷公家之慨——凡有求于他的人，他都解公家之囊以相助。结果他把大队一年收入的二分之一都花费在一些因衣食无着而求助于他的社员身上，自己并不图他们丝毫利益。受到批判后索性辞掉会计，在家里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还把家命名为“招贤馆”。他的妻子原来是峨嵋电影制片厂的美工，也辞职跟着他来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我内心不能接受老周夫妇。他们躲在世外桃源里，看来是对外界不闻不问，但是谈起社会来十分不满。这样敢说的人在那些年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用现在的话说，纯粹是社会异类。我觉得火热的革命年代对每个人都是一次考验，是投身革命还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或者是站在潮流之外指手划脚，决定了他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我更加担心的是他们这样的态度对海燕的不利处境火上浇油。



我的探亲假只有十二天，转眼就快到了，临走前三天，海燕打算请几天假带我们去伊宁市玩玩，顺便送我走。尽管她恨兵团，但她从不后悔来到伊犁，在日记上称“伊犁——我的第二家园”，她要让我们充分领略伊犁之美，并为我送行。

我和刘元到了兵团就干活，兵团规定家属干活的工作日算在职工身上，所以海燕有足够的假期。还没来得及请假的那天，我和刘元跟着连队挖水渠，有人来通知海燕，让她到团部参加一个斗批改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都是坏分子——五类分子、劳改释放犯、新生人员（说是斗批改学习班，实则就是坏分子学习班）为期半个月，明天开始，不准离队不准请假。海燕一听就愣住了，并哭起来。这时她的那些暴脾气一点都没有了，又不服气又委屈又不敢说什么。



看见海燕无助的样子，我也伤心极了。我扔下铁锹拉着刘元就去找指导员，还没开口已经泪如雨下。我哭着嚷道：“师政治部主任都说了，海燕的问题不是敌我的问题，为什么要参加坏分子学习班？我们苦口婆心地帮助你们共同作海燕的思想工作，她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你们这样一来，不是‘拉一拉’，而是起到了‘推一推’的作用。再说海燕已经多年没有回家探亲，我们千里迢迢来看望她，就在这么几天短暂的聚会中，我们一直和她一起劳动，她也一天假都没有请，如果最后几天还不让我们姐妹在一起，连送行都不让，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刘元在旁边陪着落泪。指导员没想到本来那么谦和的我这样大哭大闹，而且说得句句在理。他支吾了一阵，推说是团里点名要她参加的，连里做不了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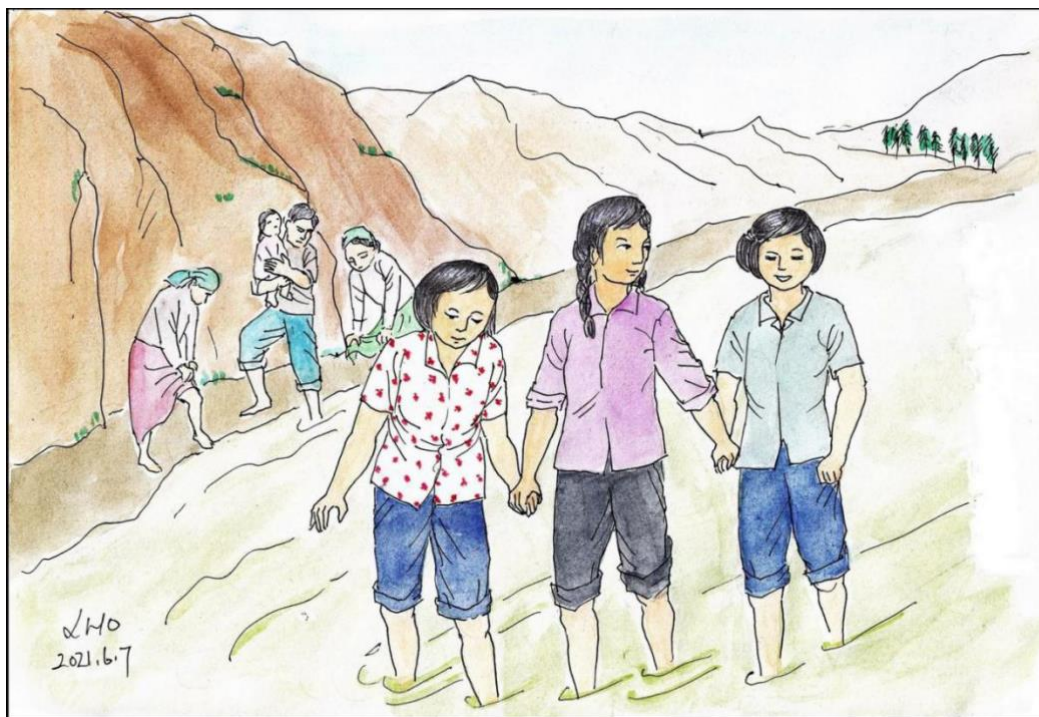


既然是这样，我决定陪同海燕一起去学习班。海燕的心情好了一些，她已经完全把我看成了她的主心骨。我们扛着行李到了团政治部学习班报到。

政治部主任一看这是什么阵势？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孩一起来参加坏分子学习班。听说是探亲的妹妹来陪读，主任对海燕说：“你回去吧，不用参加学习班了。”海燕担心主任这是气话，我也同样担心，他别以为两个妹妹是有意来向学习班挑衅的。我和主任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会干扰学习班，就先回去了。”主任说：“你们不必顾虑，我是真心诚意这样说的，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姐妹几个好好在一起玩几天。”接着他打电话给连部，取消了海燕的学习班。第一次得到这样有人味的待遇，海燕竟感动得当场向政治部主任表决心，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好好表现。她就是一个顺毛捋，只要给一点温暖，马上就化成一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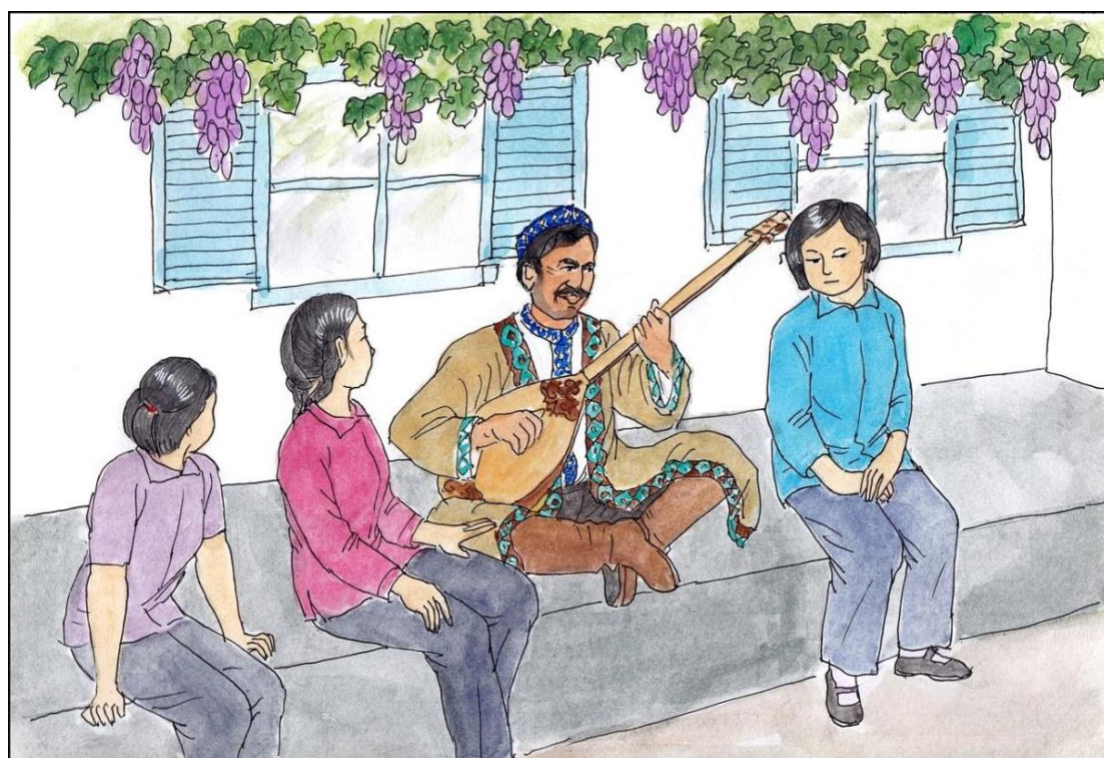
海燕得到了三天假日，带我们到伊宁市。我们是走路去的，从农场到伊宁三十多里地，要走三个多钟头。一路上，海燕给我们讲她的经历和她所认识的人的故事。海燕讲故事有极好的口才，即使平常的事情，也能让她讲得有声有色。

路上的风景怡人，我们不时停下来照相。我们来到伊犁河边。伊犁河水面宽阔，波浪滔滔。新疆的地势西高东低。东去的河水湍急跌宕，即便是路边的小沟渠的水也是汨汨奔流。河岸时而陡峭，时而平缓。岸边有几个头包纱巾的维族妇女正要涉水过河，她们提起裙摆，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脚，踏进水里试探深浅。



我们三个人手拉手趟过伊犁河。岸边的风景如画，远处有一片开阔的高坡，长满浓密的松树，与滚滚急流相互照应，一静一动，让人心旷神怡。我连拍了三张相，后来印出来把它们连在一起，留下了一幅伊犁山水图。

三个小时的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伊宁到了。



伊宁这个城市聚集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回族（在内地看到的回族人长相与汉族区别不大，但是这里的回族人相貌和维族人一样）十几个少数民族，充满了异国情调。伊宁的街头上到处是水果摊，满街是葡萄李子西瓜哈密瓜的果香，卖果子的民族群众比汉人大度得多，果子可以任意品尝，不买也没意见。我们在一个维族人开的饭馆吃了午餐，是羊肉包子，油香盐咸，味道特别醇厚。

到伊宁的这几天海燕准备带我们访问她的朋友们。她在伊宁的朋友都是少数民族，她热爱少数民族，爱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歌曲舞蹈，他们的吃穿，他们的长相，他们的身材，他们的家居，他们本人，一切的一切。而海燕在新疆的厄运和她所交的朋友紧密关联。

到底是些什么人让海燕这么倾心，我充满好奇，便跟着海燕去了，她先带我们去原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作曲家乌斯满江的家里作客。据说他有一次参加巡回演出从马上摔下来，把腰摔坏了，便从北京病退回来，在家中作曲，然后寄给歌舞团。他做的歌曲有五十年代的《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六十年代的《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在六十年代，中国以第三世界的救世主自居，我们肩上的重任是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的阶级兄弟，在天安门经常举行几十万人大集会，声援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斗争，比如伊拉克、越南、古巴……这首歌就在天安门广场和收音机里反复播放）、还有《农庄姑娘》等。

乌斯满江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坐在院子里。院里有葡萄藤架子遮荫，他弹起东不拉为我们唱了好几支他创作的歌曲。他的声音浑厚悦耳，音色饱满又欢快活泼。海燕非常喜欢结识这些艺术家。

我对乌斯满江本人没有任何成见，喜欢他的豪放和热情，但是我担心的是海燕，和维族人交往是兵团禁止和痛恨的，对海燕非常不利。

海燕又带我们去回族朋友艾斯玛家。这家人的生活水准属于中下等，但是回族人不管生活境况如何都把自己的家弄得干净舒适，汉人是远远做不到的。房间里充满异国风味，墙上是波斯花纹的挂毯，房屋的正中的地面铺着地毯。两张单人床在地毯的两旁，用色泽鲜艳的床罩盖着，床头各放一个硕大的方形枕头（海燕特别欣赏他们夫妻分床睡觉）和绣花靠垫，桌布窗帘都是手工镂花刺绣的，均出于女主人之手。



海燕说这家跟她借钱已达六十多元，可是还不起，就用劳力来顶替。海燕请艾斯玛帮她做两件维式棉袄，两件维族小褂，两幅窗帘，一件制服，以抵销这六十多元。在今天看来海燕是占了大便宜，可是那时候，在北京裁缝店做一件衣服也就一块来钱。所有的工钱宽打宽算加起来也超不过二十元。何况棉花布料棉线全都要海燕自备。问题是制作的衣物也拿不回来，总是拖着，拖着，直到海燕离开新疆时才拿到一些。

这些衣物海燕几乎都送给了妹妹们。在北京冬天我穿着一件维式棉袄做大衣。黑色的，立领，紧袖口，通身匝着线条；夏天我穿着胸口有十字挑花的维族式花纹的衬衫。我非常喜欢这些衣服，因为它们在北京显得很特殊。那两幅窗帘我至今还留着，一直没有机会挂在窗子上，（维回族的窗帘不大，也就四十公分长，三十公分宽）。海燕去世后，我把它珍藏起来。一是把它当作一个永远的纪念品，二是我不能再看到任何与海燕在新疆有关的东西，一看到就无比的心疼。维族小褂还剩了一件。我也收藏了起来。

在伊宁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我走的前一天，原定我们到铁匠麦哈尔家去取海燕给我订制的新疆匕首并吃饭，但是在路上我和海燕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海燕在兵团的一大“罪行”就是和地方上的少数民族来往，这是兵团纪律严格禁止的，但她不管不顾，依旧偷偷和少数民族交往。我实在地为她的政治生命担心。我想趁仅有的一天把我的想法全都灌输给她，可是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不想对少数民族作出如何如何的指责，客观的情况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并不以自己是“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成员为荣，在他们的深层意识里，他们是独立的。几百年来，他们争取脱离汉人统治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清朝和民国的多次暴动就不说了，近的如 1963 年的“伊塔事件”，逃离中国几万人。在七十年代，又有“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地下组织搞得轰轰烈烈。政府对付的办法就是坚决镇压，从上到下抓了无数的人，轻者服刑役，重者枪毙。其结果是他们对汉人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下，维族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对汉人有一种天生的抵抗情绪。至少，在平民的心里是不喜欢汉人的，是不会真心实意地和汉人交朋友的（此文写于 2000 年代，如今汉人对维人的镇压手段就更上一层楼了）。

我们越吵越厉害，最后我拒绝去麦哈尔家吃饭，并且和海燕在街上分道扬镳。看见海燕一个人气哼哼地，“腾腾腾”快步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海燕这个人心地善良，与人相处情真意切，不存戒心，只要别人一句暖和话，就能让她掏心窝子。在一个人情险恶的环境中她只想寻找一些家庭的温暖，这就是为什么她要 and 民族朋友交往的原因。我那时根本不理解。

我的脾气也拧，心里觉得自己这样对海燕可能过份了，但还是硬着心肠离开了她。从小到大，我们打架后都是海燕主动求和的。

晚上海燕回来，给我们带来了铁匠家的饼卷烤羊肉。我们又和好了。



8月23日我离开伊宁，海燕送我时早已忘记几天来我们激烈口角的不愉快，又哭了起来。她把积攒了多时的，自己晾晒的苹果干装了一大袋，让我带回北京，寄给爸爸妈妈。我心里也非常难过不舍，想到她探亲有望，稍感安慰。可是她回北京又能怎样呢？户口、工作都是问题呀，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我临走之前海燕得到消息，师政治部主任要亲自找她谈话，因为全团都知道了刘海燕七年没有享受过探亲假，她的妹妹为此千里迢迢来探亲，影响太大，师里不能不重视。海燕慌了，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已经来不及陪她去谈话，临时给她写了一个详细的提纲，海燕反复阅读，记住了重点。

海燕后来和主任谈得很好。一开始主任就说：“你妹妹们这次来，对我们也是个教育，你犯了错误我们是有责任的，你父母把你送到新疆，交给我们，我们没有很好地帮助你，我们在你父母面前并不光彩。”

主任说，很多实情政治部并不知道，材料没有送上来（都压在连里了！）。好消息是，经过调查了解，她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回家探亲。

这次谈话让海燕倍受鼓舞。

回顾我这次出使西域，不辱使命。最大的收获是从师领导处知道了关于海燕的底线：是一个“认识问题和态度问题”（平心而论，他们还算讲究政策）。海燕本人破罐破摔的态度，我行我素的作为以及交友不慎的问题都有所转变。她在园林队搞得支离破碎的群众关系多少有所挽回。剩下的就看海燕自己了。

海燕在1972年年底终于获准探亲假，并且兵团同意她离开兵团自寻出路。

1973年底，海燕离开了她深恶痛绝的兵团，带着一身的伤痕，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肉体上的，还带着从来也没改变的天真、率直和任性回到了北京。

1978年海燕考取内蒙古师院外国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国文艺部。2002年4月28日海燕患肠癌不治，与世长辞。得年57岁零23天。📷

【评论】

变幻莫测的“游击”

文 靖

解放前后，关于“游击主义”“游击作风”“游击习气”的表述，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折返跑般的大逆转。本文以《人民日报》1946至2020年的数据为参照，做一简要的回顾，并在对比中略加评论。

早在红军时代，被广泛运用的游击战除了具备灵活性、非正规性之特点，自由散漫的“游击作风”也相伴而生。即便1936年，毛泽东将游击战争上升到了“战略”高度，称其和主力军“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同时也点明了“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¹1938年，毛再次从战略高度谈游击战争，依然强调：须在诸多方面“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²可以说，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时代，问题始终存在，所以不断整顿军风。

194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

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毛选》第一卷，第210、213、215页。

²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毛选》第二卷，第403页。

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³所指不仅限于部队的正规化，还包括“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意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方方面面。

根据《人民日报》的表述，解放前、后几年，对于“游击主义”“游击作风”“游击习气”始终持否定态度。尤其1948—1951年间，被认为是过去长期游击环境中“残存”的作风，在正规建设中就不适当了，要“克服”“取消”“批判”和“彻底转变”。而且，各行各业皆如此，都在强调正规化。

大略上说，“反右”以前对“游击作风”一贯否定，几乎没有第二种声音。

1957年，忽然就不一样了。

《人民日报》7月12日第11版《马哲民的谬论和他的出路》，即傅景文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上的发言，大骂民盟的马哲民，说他在鸣放中“向共产党展开了狂妄的进攻”，诬蔑、反对党的领导。其中最后一条，针对马哲民的话：“党员都是木头人，没有脑筋”“老党员文化水平低，什么也不懂，思想上是经验主义，行政工作上也是游击主义；知识分子新党员缺乏实际，是教条主义。两种人相结合就成了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此条“谬论”被认为是在“侮辱党员和党的干部”。

仿佛忽然之间，批评“游击作风”反成了被痛批的理由。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正名，认为是“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⁴此时所指，已经不再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而是针对游击战的“灵活性”（又曰“高度活泼性”）和“发动民众”⁵。特别是后者，即所谓“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正是我党一贯的作风。

9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祝河南大捷》，庆祝河南日产一万八千多吨铁，其中写道：

我们党沾染这样的“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数十年于兹，可谓久矣，也可谓深矣，不但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而且好得很。……今天，虽然

³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毛选》第四卷，第1288页。

⁴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18页。

⁵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毛选》第二卷，第381—383、392—395、404页。

不打游击了，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建设，同群众打成一片的所谓“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作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作为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正应该在工业建设工作上发扬光大。

自此，话锋变“贬”为“褒”，成了第一次逆转。“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被表述成“光荣传统”“优良风气”，是“可贵”的，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实际上这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和气派。只有具备这种作风和气派，才有高屋建瓴、指挥若定的正确领导，也才能够发挥人民群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把一切陈旧事物一扫而空的革命干劲和英雄气概。”⁶

1958年9月，毛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⁷这话经常被引用，甚至在10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同一页上就出现了两次。于是乎，所有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所谓“讥讽”“攻击”都成了对群众运动、群众路线的藐视，是资产阶级思想，是错误的论调，是对党领导的攻击。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必须走群众路线，而所谓“正规化”其实是“官僚化”，等。

此类表述，集中出现于1958年9—12月底。

1960年9月30日，《毛选》第四卷出版。10月13、14日，《人民日报》第七版连载了欧阳钦的文章《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体会》。其中讲到党建，当然就得讲1948年的《通知》等等重要文献，也提到了“游击主义”。可笑的是，作者完全忽略了它的前后矛盾，却用一个很长的句子，“淡化”或者说“歪曲”了原文中“用最大的努力克服”的意思，顾左右而言他，转而强调党的绝对领导。

此后将近七年，《人民日报》不再涉及“游击主义”“游击作风”“游击习气”。直到1967年重又提起，但声音甚微，了无新意。无外乎套用之前的论调，把“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说成是“传家宝”，而反对者，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污蔑”。

大略上说，从“反右”以后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贯肯定。只不过在表达力度上，由坚决肯定，转为原则上肯定，或者念

⁶ 熊复：《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打开了》，《人民日报》1958年11月7日第五版。

⁷ 《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头版。

经式的习惯性肯定。

此后，“游击习气”等表述再次淡出。1976年文革结束前，《人民日报》仅仅涉及了三次。

197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在第一、二版刊登《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指针》，其中有言：“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路线。”有些人将“群众路线”贬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妄图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毛主席彻底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

然而，在前后几年中仅此一条。此后又绝口不提，甚至是避而不谈了。

1978年底拨乱反正，至今，四十年间《人民日报》有关“游击习气”等的表述，主要用于历史回顾，缅怀老一辈革命家。比如，黄公略在红军时期，李达、张爱萍在八路军，项英在新四军，萧劲光在留守兵团时期，贺龙、郭天民在解放之初，如何整顿军纪、克服游击习气。1950年彭德怀治理西北军队时，更说出了掷地有声的话：“游击习气就是抵抗法制法令”“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绝不能姑息养奸，心慈手软”。

习近平时代，高度强调从严治党。2013年上台之初，在西柏坡九月会议旧址，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所以在习的时代，一以贯之地强调建章立制，强调纪律、强调规矩，视之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可以说，“游击主义”的时代，至少从话语层面来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愿如此。

如今，“游击主义”“游击习气”“游击作风”的表述已经成为“过去式”。偶有涉及，也回到了它最初的语义上，成了被嘲讽的对象。

遥想1948—1951年间，它们轰隆隆地来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要“克服”“批判”。在革命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下，有股要捋胳膊、挽袖子大干一场的劲儿。1958年却猛回头，被偷换了概念，换成一副“正义”且凶恶的嘴脸，狂吠不已。历经二十年淡出舞台，语义才悄么声？地回到从前，就像生过一场大病，而病中所做的恶，全然都记不得了。❏

【评论】

季羨林谈北大的两派

向南雷

在北大的教授（教师）中，季羨林是评论北大两派最多最尖锐的一位，也是承认自己的派性，并对自己有所剖析的一位。本文先讲季先生对北大两派的认识。

季先生这样介绍北大的两大派：

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怎样斗争，我不大清楚，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费厄泼赖”的。在中国，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只管目的，不择手段，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叫做“派性”。这种新东西，一经产生，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对抗外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对抗力量？

季先生看得很准，只管目的，不择手段。这是中国政治的通则。造反派在这方面是无师自通。他说自己不理解“派性”，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派性的人。不过他对两派的评价还有价值——

现在时过境迁，怎样来评价这两大派呢？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上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和学生组成。由于种种原因，老头参加的是不多的。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

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有时候，一个被诬蔑成有问题的教员或干部，两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两派都有点患迫害狂的样子，以打人为乐事。被打者头破血流，打人者则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颇具匠心，自行车链条，外面包上胶皮，打得再重，也不会把皮肉打破，不给人留下口实。那一位“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谁是江青的最忠实的信徒，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两派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则始终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牛棚杂忆》第41-42页）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此时此刻的季先生，再也不用隐藏自己的观点，“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同上，48-49页）

季羨林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1967年11月30日深夜，新北大公社红九团的六七个大汉（多是他的学生），闯入他家，将季氏夫妇和他的儿媳赶到厨房，对他的楼上楼下车库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扫荡。抄家的走后，“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同上，53页）。作为井冈山九纵的最高领导，季羨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组织身上——

天一明，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

季羨林是坚定勇敢的反聂派，他投身井冈山，为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用说他是九纵的最高领导，就是一个普通一兵，遇到这种情况，井冈山总部也应该给予安抚和保护。然而，季先生的希望落空了。总部仅仅派了一个摄影师到他家拍了拍抄家的现场——摄影师的任务不是为抄家留下证据，为他讨回公道，而“主要寻找公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者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同上，55页）总部非但没有替季先生找公社算账的意思，反而把矛头指向了这位为井冈山拼死拼活的纵队领导。季先生发现：“多可怕呀——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同上）

季先生的一片痴心来自于常理，他以为，咱们既然是一派的，我遭了对立面的迫害，我就应该得到本派的保护，就能在本派那里寻找到安全感。“我想留在井冈山总部里。我害怕，公社随时都可能派人来，把我抓走，关在什么秘密的地方。这是当时屡次出现过的事，并不新鲜。井冈山总部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他这位有功之臣，纵队司令，在井冈山领导人那里，不用说人身安全，就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准备同公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我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我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

这里所说的被调查者，就是67年8月投靠井冈山，并被拥立为第一总勤务员的副校长周培源。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季先生由此想到自己，想到两派共有的思维方式——

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

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用那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东西能准确吗？能公正吗？与其将来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同上，55-56 页）

季先生毅然离开井冈山总部，回到自己家中。他很快发现，“宰割”他的，不仅有他造谣谩骂的公社派，还有他同情的、投靠的、为之失去理性的井冈山。“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60)“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79)此时此刻，随着他对井冈山的彻底绝望，他对派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❷

【怀人】

清明祭：悼念我的丈夫蔡鸣乔

苗致平

鸣乔：

你还好吗？我很想念你！

去年的那一天，你的生命划上了沉重的句号，咱俩长达 54 年心心相印，惜惜相依的人世间的情缘被无情斩断。那只站在高高的乔木上鸣啼的小鸟累了，它不舍的，回望着，或许已经魂归故里，我想你定是去往了天堂。

鸣乔，你走了。亲朋好友来为你送行，弟弟、弟妹从北京赶来，你在常州，深圳，南昌的家人发来唁电，在沈阳工作的你的学生也闻迅赶来，在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和美国的同学发信致哀，更多的是你的同事，学生纷纷到家里来吊唁。师大的校友，黎云的作者，还有与你从未谋面的学长，都撰文追念你……人们敬佩你的人品，欣赏你的才华，称赞你是一位有学识和修养的人。

鸣乔，你的一生是勤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一生。

你怀着对教师职业的忠诚和对物理科学的热爱。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奉献了三十多个春秋，教授了涵盖理科和工科大学有关“电”的诸如《电磁学》《电子线路》《电工学》等等多门科别，你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更是同行们的榜样，你的声誉和威望在这座边境小城里已远近闻名。曾获得殊荣不胜枚举，如国家级的曾宪梓奖，和省、市级多次奖励等。你以深厚的知识积累为铺垫，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方寸讲台怎能容下你胸中宽广无边的大千世界。你总是能从千变万化的万物之中提取内在规律，为你的授课增添无限魅力，令学生在题海之中去领略如登泰山之巅般“一览众山小”的愉悦。多年的辛勤躬耕，终已浇灌出了满园的芬芳桃李。

鸣乔，你既是孩子们的慈父，又是他们的严师，你把对儿孙们的关爱和期许融进日常的点点滴滴，琐琐碎碎之中，润物无声地时刻陪伴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记得大儿子出生时，条件艰苦，我的奶水极少，当地又买不到奶粉，你就急得天南海北，千方百计地托人去买，后来，咱们还开玩笑地称大儿子是吃爸爸的奶长大的孩子。你在《六句感怀——退休有感》中写道：“我自将心向静水，惟愿子孙胜乃翁”，足见你对孩子们的厚望之良苦，他们懂得你的用心，定会时刻谨记你的教诲。

鸣乔，你的侄女琳琳称你是“为人处事的楷模”，是对父母的“孝心最浓”，对亲人“情谊最重”的小叔叔。我记得当年刚入大学时，在咱们物一（3）班开第一次班会时，你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你穿的那双用白布滚着边的阴丹士林蓝的布鞋，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感到费解，一个男生，怎么穿这样的一双鞋呢？后来才知道，你是在为你读高二时故去的父亲戴孝，你把这份孝心从江西老家带到了北京，以告慰你的父亲。

你的学生称你为人生的导师；你的同窗学友把你当做知己；因为听了你的物理课，决心报考物理系的学生记得你；读了你的文集《衍射光》的朋友，夸你是“物理学的翘楚，而长于诗文”的“文理兼备的通才也”……。鸣乔，你担得起这些赞誉，你在你熟悉且热爱的领域活出了自己的精采。

鸣乔，你的一生是敢于担当，正直磊落的一生。

1971年，北师大的“4.26事件”，给你留下了一段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记忆。那一年，那件事，那些人，那一段风雨岁月，给你带来的创伤，在你内心深处从

来不敢遗忘。但每每提起，你都以坦荡的心胸面对那些沧桑的过往，将这段经历公布于众，也是你一直以来的一个执念。记得我曾提醒你：“这样做无疑是把流着血的伤疤揭开来示人，你能经受得住这第二次的伤害吗？”。当时你是这样回答我的：“谈及师大的文革史，有两件事是不能回避的，一件是砸孔庙，另一件就是 4.26 事件，这个事件涉及的无辜学生之多，关押学生时间之久，在北京的高校也属罕见。作为当事人，我愿意把我的真实经历记录下来，这是我想做的，也是应该做的。”

听了你的这番话，我，无言以对。

《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从被囚到平反》记录着一段被历史错过的真实，它是你那段不寻常的亲身经历的实录。既然是实录，就容不得半点虚构，也容不得一件伪情。你写得很慢，一方面，需要查阅你手中保存多年的原始资料，仔细筛选，合理引证；另一方面，因为时间久了，免不了当时的有些事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了，凡是感觉到不太准确的地方，你都要去反复印证，哪怕是一件小事。比如赵亮坚先生去世的时间，你就询问了所有能想到的，对这件事有可能了解的人……。这不仅源于你一个理科生严谨的思维习惯，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你对历史事件的尊重和你心中的那一份责任。鸣乔，你本性坚韧，能顽强地抵御风雪严寒。你秉性纯良，能以宽容的心态善待人性的不堪。为了不伤害你不想伤害的人，你的回忆录甚至把原稿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宁可让前后叙述失了连贯，你反复推敲，句句斟酌，隐去了几乎所有人的姓名，前前后后共修改了七次，才最终成稿。足见以德报怨是你善对生活中的风雨和不公境遇的人生态度。你的这篇回忆录，是一篇敬畏史实，艰守良心之作。

鸣乔，咱俩退休后的那段日子，是惬意的时光。充分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或一时兴起，背起行囊，携手来一段只有俩个人的自由行旅程。咱们有充足的时间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听音乐，谈美术，评历史，品文学。……我是你写的那些回忆录，游记和诗歌的第一个读者，读完你写的《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我对北师大“4.26”事件的几点看法》和《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两篇文章后，仿佛又看到多年前坐在师大物理楼教室角落里的你，虽不露锋芒，却有自己的见地和主张，每每经过深思熟虑的陈述，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而现在我眼前的你已是一个头发花白，年至古稀的老者，五十多年过去了，你饱

尝了人性的险恶，经受着病痛的折磨，社会的变迁也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和观念。所幸的是，你依然像年轻时候一样，坚守着那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风骨，清醒且独见。当谈到你写这后两篇文章的初衷时，你对我说：“我不关心当初师大二派争斗的是非与对错，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应该摒弃派性的立场。读史明智，反思文革的目的地是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对我们每个普通人而言，也要学会在风浪来临时认清方向，不随波逐流，更好地保护自己。我的文章只是想在这个层面上，做一点点初步的尝试罢了。”你的这三篇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深度，围绕着4.26事件的文章，是你献给亲爱的母校一份特别的礼物。

当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在征集书名时，你建议用“师劫”二个字做书名。“师劫”两个字，揭示了你的母校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所经历的劫难。也不禁使人联想到在那场运动中广大教师们受到的冲击，和尊师重教这个传统观念的陷落。

《师劫》终于面世了。收到《师劫》了，你极少有的主动要求我给你照了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旁侧亲自写下了你的几句感言：



鸣乔，我每次读到这只有几行的自由体“小诗”（暂且叫它小诗）的时候，体会着当时你的心境，总会有一种发自内心五味杂陈的感动，我把你的这几行小

诗称作“你的感言”。

鸣乔，你的一生是令人敬佩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你活的通透，活的磊落，活得有价值。《衍射光》是你留给我和孩子们的念想，也是你留在这个人世间的印记。

鸣乔，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给了我许多女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爱，这是你留给我的一份特殊的遗存，如今我会把这份爱化为对你深埋内心的思念，让这份思念代替你陪伴我，一起去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共同企盼你的夙愿达成的那一天。

梳理这篇文章，我思酌良久，那些静好与无奈一起涌上心头，让我心无法释怀。逝者已去，道不完的凄凉，但对生者而言却是无尽的缅怀……

行文至此，不禁借用苏公一段绝句，以寄托哀思。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安息吧，我的至爱！🕯

你的爱妻 致平，2022 年 4 月 2 日

壬寅清明，书于丹东

【述往】

我的初恋

石名岗

一、书中自有…

初恋有时只是一瞬间，但终身难忘。

记得是在 1967 年 7 月，文革劲头正盛，当时我在山西轻工业学校红色暴动委员会主办的《红色暴动》报作编辑和刻印工作。7 月末，突然从京城传来一则坏消息：在中央举办的解决山西问题“七月会议”上，我们这一派的头头，被一位康姓的中央领导蛮横指责，中央文革支持了我们的对立面，我们所属的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那天，听到消息的人都一脸沉重，意识到最严酷的打砸抢时期将要到来。大

家把该转移的资料转移走，把油印机就地掩埋在办公室的砖地板下，徐宪成同学拿起毛笔蘸上墨汁，在粉白的墙上写下“国际悲歌歌一曲，我自横刀向天笑”十四个大字，好像对办公室作最后的诀别。不出所料，第二天对立面轻院八一八出动几百人，拿着铁锹、棍棒，分两路，对轻院东方红、井冈山、红暴、新安江进行打砸。办公室被砸得一塌糊涂，敢于反抗的同学都挨了打，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头头们被抓后与军分区的领导一起被游街批斗。一时间校园陷入了一片混乱。

我们这一派的同学，有的到了总司最后的据点晋华纺织厂避难和坚守，有的住在宿舍当了逍遥派，有的干脆回了家。当时我也回了家，意图从书中寻找我们失败的原因。

好在父亲是《山西教育》杂志的副主编，家里不缺的就是书。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开始自己追寻真理的旅途的。在一口气读完《共产党宣言》时，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居然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给了资产阶级很高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概括其历史唯物论思想，即社会形态不能跳跃的论点，给了资本主义合理的存在理由。这些论点使读者隐约感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不同点，马克思实际上可以成为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提出质疑的理由。马克思的学说主要建立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制约上，即社会进步是产业革命的结果，而非社会政治革命的结果。因此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产业革命社会结构改变的动力，而过急的社会革命只能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社会的分裂。基于这种认识，我已没兴趣继续参加文革，思虑自己该怎么办。

在企图通读马恩著作的过程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自然界的神秘吸引我去学习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在这方面我也有着特殊的优势，哥哥是矿业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姐姐是山西大学数学系当时在校的大学生，数理化的可是信手便能拈来。和看小说一样看数理化教科书，从小不太好好学习的我似乎变了一个样子。《自然辩证法》像一个索引，使我能很快能理解数理问题的实质，如恩格斯说“变数”是把辩证法（运动）引入了数学。经过几个月的恶补，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尤其思想的收获对一生的影响难以估量。

二、邂逅

这似乎是我的前半生中最闲散的日子，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到省府（府东街）门前看大字报了解动态。

1968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黄土高原的二月下旬已经微微的暖气。那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从家出发去看大字报，沿着解放路走到市中级法院门口，突然看见一个姑娘推着自行车从法院门口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余维平，她也认出了我。四年不见余维平出落成一个姑娘了，大大的眼睛，俊俏的脸庞，一米六八的个子，在我眼里就是倾国倾城的美女。

我问：“余维平，你在这里干什么？”她答：“给我爸爸送物品。”细问之后，才知道市中级法院中设有看守所，一年前省城“一一二”夺权后，被打倒的省市领导都被关在里面。余维平的父亲余德海原为市委副书记也被关押在此，她是探监给父亲送衣物的。真的，我当时很佩服这个女孩的勇敢，佩服她的人性（在那种没人性的时代，没和父亲划清界限），设身处地的想，生性胆小的我不见得能做到这一点。

我问：“你爸咋样？”她情绪低沉的回答“还好吧。”我又问：“你是否还住在桃园一巷宿舍，没被人家撵出来吧？”她回答：“还住那里，没有被撵出。”聊了几句各自的情况，我们就分手了。我也没去看大字报，心绪不平地转头回坊山府省府宿舍的家里。

余维平与我一样，生于1948年。她的名字源于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之时，原名“围平”，即包围北平之意，是某位省级领导起的。在初中她是团干，品学兼优，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各科都在九十分以上，是男孩子们仰望的班花。

在初中我年纪小，在班里与她没有太多的交集，只记得她和我掰过一次手腕。那时我个子小，别人觉得我不行，结果是我胜了。其实，我在班里也是很出名的。是不好好学习成绩还可以的“化学脑袋”（别的同学起的绰号）。有一次，上课睡觉，老师点名叫起我，让我用“凝视”一词造句。我顺口造句“我凝视着鱼”，老师说：“凝视是眼睛盯着不动，鱼在游动，你咋凝视？”答曰：“我脖子动，眼睛不动。”全班哄堂大笑，老师尴尬无比。估计在她的印象中是很深。

我想，她就是我追求的理想对象。我看过多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羡慕保尔·柯察金的其它方面，但羡慕他和冬妮娅的两小无猜的爱情故事，觉得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他俩将会怎样？我也决定来一次一个调皮的男孩对一个偶

像的追求。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毕竟我自以为是一个头脑里装满新思想的人。

三、一封唐突的信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项胆小的我，在荷尔蒙的冲击下，给她写一封信投石问路。这封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维平（请允许我贸然这样称呼你）：你好！

那天偶遇好像是老天的安排，特别佩服你的勇敢、坚强及单纯。我想，我们出自大致相同的干部家庭，出自多少受到这场革命冲击的家庭，有必要共同携手探行，应该相互搀扶前行。为此，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

我的祖辈生活在山西翼城县东部与沁水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石光华生于1884年左右，是一辛劳的农民。祖母吉氏是翼城县著名的大户吉家三姊妹之一。经过辛勤劳作，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成为小富人家，拥有八十亩地及二十几头骆驼跑运输。1938年，我军一部在周围民众支持下，在翼沁交界处设伏，歼灭日军运输队一千多人，次年日军进行报复性大扫荡，祖父为掩护群众转移坠崖而死。父亲石伯崇出生于1914年，母亲张庆香出生于1915年，两人属姨表兄妹，即我姥姥也是吉家三姊妹之一。1929年，父亲在吉家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考入山西进山中学。期间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1934年父亲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并加入民先，1936年入党成为大学系统秘密交通员，1937年抗战爆发回乡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任牺盟会中心区秘书。抗战期间，父亲曾任翼城抗日县政府秘书，二区区长等职。其中在国共摩擦期间，有一段打进国民党五专署内部任少校文书，有一次被共产党员掌握的马统三支队准备拉入八路军，被国民党发现准备解除该部队武装，父亲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马支队，使马支队脱离险境。但由于这段历史一直无法证实，父亲一直得不到重用，后被派到太岳师范任副校长。解放后父亲历任临汾师范副校长、山西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山西教育》副主编等职。文革被批为“教育厅的黑笔杆”。我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1966年因病去世。另我有一哥（在太原重机厂技术科）一姐（你认识）两个弟弟。我的家庭情况大致如此。

真的，这两年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你知道，我是一个不求进步的贪玩的人，

从来没和别人争过什么东西。65年被班主任定为落后的典型，66年母亲去世，文革开始后划分左中右反，又被划为右派，就这样只好积极参加批资反路线，参加造反。不管我们这一派是对是错，我个人等到了很大的锻炼，哈哈，至少能刻印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字。经过七月会议后的失败，经过几个月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认识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认识到了康生等高级领导的不讲理，革命似乎就是不讲理，因为越大的道理其中的矛盾越大，每个人都会占一面理。这是我的胡思乱想，不一定对。但有一点肯定是对的，就是过激的运动肯定会失败。按历史唯物论，那种理想的社会不会建立在我们这样贫乏的经济基础上；按辩证法，物极必反，极端的行动必然会走向反面。我不想说太多的哲学道理，但历史证明极端派掌权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俄国革命中的托派等。我觉得，你爸爸他们一定会出来，我们在一起坚持再坚持吧。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虽然到了批判，但确实一条真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想要尽快发展，想要“物资极大丰富”，我深信，国家和社会总有急需“数理化”的一天。当然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这一天，我们应该积极地自学。“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一起去结网吧。好不好。

你是我心目中的公主，这封信就当作我对你的第一次求爱吧！

此致

敬礼！

石国英 1968年3月1日

我在咚咚的心跳声中，用颤抖的手慌乱地塞进邮筒，开始忐忑中的等待……

四、惊喜

仅过了一天，1968年3月3日上午，家里快没粮了，爸爸嘱咐我去买粮。唉，买粮是我最头疼的事，又得排队，有得分清各种粮食的比例及数量。没办法，只好拿上粮本、粮票、钱及大小口袋，叫上弟弟，推上自行车，到五福庵粮店排队买粮。感谢老天爷，到了粮店排队的人还不多，只有二十几人，估计两个钟头能买上粮。我拿出苏联人编的《数学分析原理》边看边排队，旁边的人好奇地看着我，肯定是想这年月还看这种书？

一会儿哥哥突然过来，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赶快回去，有一个女同学找你。”我几乎也懵了圈，赶忙把买粮的本、票、钱及袋子交给他，几乎是跑着回家。余维平坐在我家大房间的写字桌旁，微笑的看着跑的气喘吁吁的我。突然被幸福袭来，有点不知所措了，慌忙说：“你来了。”连忙拿了个杯子给她冲了一杯果汁粉，这是我招待客人的最高待遇。父亲虽是 14 级干部，但住的房子不大，也就两室一厨，姐姐回来没地方睡，只能睡在十平米左右的厨房。余维平看到没说话的地方，对我说：“到我家去吧。”这样，我和余维平一下子成为朋友了。

市委领导住的是别墅式的小院，余维平家虽然没被赶出，但建筑供领导在家办公的房间已被市委的工人家庭进驻占用。她家住在主建筑里，引进去有间大客厅，有三卧一厨一卫，有前后院。余维平是家里的老大，有两妹一弟。父亲被关押后，妈妈又不敢不上班，家里全凭她跑上跑下了。

她的房间是个不大的卧室，我们就在这不大的房间开始了我们的海聊。她家是五台县著名的余家人，她父亲 1937 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晋察冀工作，我看过《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系列革命回忆录集，对红色历史很熟悉，不时地插上几句嘴。说着说着中午到了，我起身想道别，她说就在这吃饭吧，我本来就不太想走，就顺势坐下了。虽然饭很普通，是茄子炒肉面，呵呵，这是我吃的最舒坦的一顿饭了。

饭后，我们就开始制定学习计划，规划先学哪几本书。我对她讲了我对一些书的理解，快到晚饭了，我依依不舍地告别走了。我有了学习的新动力，深怕被她赶上，她问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那就太尴尬了。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成为她家的常客。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给父亲 sing 物品玩，一起讨论问题，我希望我能成为她终身的守护者。

五、竞争者

有一次我去她家，碰上了一位初中男同学贺怀才。这位同学号称“秀才”，写得一笔好字，初中毕业后考入山西省公安技校。很明显我是遇到了一位竞争者，但我丝毫不怕这位竞争者。论艺术，我是美术专业毕业；论理论我是自修大学毕业；论数理，我正在学大学课程；论体育，我是乒乓好手；论智力，我可会下象棋盲棋。并且我深信有马克思的保驾护航，加上余维平的信任，有能力击败任

何竞争者。

言谈间，他谈起对《马克思青年一代》一书看法，阿弥陀佛，幸亏我读过这本书。

他说，他不羡慕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只希望有约翰斯托克与珍妮维耶娃的爱情。马克思与燕妮爱情众所周知，而约翰与珍妮的爱情就知道的人很少了。约翰与珍妮的故事，是书中为了烘托马克思、燕妮的爱情，而虚构的一对下层工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秀才认为马燕爱情是理想型的，约珍爱情是现实的。

当时我很狂，对他的理论不以为然，我追求的就是马燕式的爱情。我说，事实上马燕的爱情是现实中的，约真的爱情是虚构的。我以为书中把马燕的爱情搞得理想化了，其实在马克思穷的付不起房租，差点被房东赶出来时，也被燕妮所埋怨。估计用中国话说，就是“笨蛋，啥也干不了”。一下子把两人逗笑了。

后来事实证明其实是我错了，我们真是对付不了现实的残酷，理想终将被摧毁，我的看法与我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不相符合。但是我还是想把我和余维平的关系引向理想。

后来，贺怀才给我写过一封信，提到了他对余维平的爱慕。那封信写得很真切，很深沉，我感觉到他感情泄出难以收拾。他对余维平的评价很高很高很高，这是我所不能及的。我自认为虽然余维平学习成绩极优，但我在思想上和才学上要高出她很多，这就是我“征服”她的“武器”。我知道，即便余维平身处逆境，追求她的男孩子也会很多，不过他们不具备我的“武器”，很难“征服”她。

六、没有告别的分手

正当我们热恋准备深入之时，1968年10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包括军人）进校，开始对学生的整训，限制了我们的自由。

工宣队对学生宿舍进行了调整，工人与学生一对一配对居住。并且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一一登记，以分清敌我友。记得我如实把父亲的问题登记之后，那些工宣队看我的眼光都变了。这件事我真后悔，我真不应该登记父亲的问题，不然我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肯定能分到好地方。

果不其然，1968年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班两个工人成分的同学分派到了太原纺织厂，我与其他出身有点问题或普通同学被分配到介休山西印染厂，我

开始忧虑自己的命运。

我在介休无亲无故，真呆一辈子？

即便我愿意，我也不愿意让余维平跟着我在介休毁掉她的前途？

我愿意跟随余维平到任何地方，但她高中未毕业没工作？

我虽然遇事胆小，但从来是个果断的人。这时真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现实摧毁理想的可能性增至无限大，学到的学问和策略没有一项能用上，怎么办？

我让同学拿着我的分配材料先到介休报到，我想在太原待几天再思考思考，实在不能等了，同学通知1969年1月4日必须到厂。3日下午，我骑车到余维平家准备通知她与她分手，心想她跟了贺怀才，也比跟我到介休强。到了她家门口又想她不分怎么办？那天下午感觉挺冷挺冷的，不知是天气冷，还是心里冷。我在她家周围徘徊了三个多小时，真痛苦！真痛苦！！真痛苦！！！真想大哭一场，最后决定还是不告而别分手吧，我真忍受不了面对面的痛苦。从她家到我家五里左右的路，我骑车晃悠了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深深的不甘，不舍，不愿离开了太原，走向命运莫测的介休。在列车上，我想维平会不会恨我？恨我的不负责任？恨我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她。我恨自己的懦弱，感到深深的愧疚。但我也恨工宣队，恨不公的形而上学的阶级斗争论。❏

【述往】

两期“社教”及“文革”

盛天任

1964年3月底，我到省卫生厅工作，职务是副厅长（党组成员），分工负责政治工作，因此兼任机关总党委第一书记，另配专职的第二书记张诚（原省商业厅政治部主任）和两位专职的副书记冯正乾和冯贵敏，所以我不大过问具体工作。初到一个新单位，先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我到直属单位开了几个座谈会，又到淮阴、连云港等地、市看了几个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记得第一次在墟沟住在望海楼清晨看日出的情景，那一轮红日从海上冉冉上升，而离开水面的一刹那是跳跃出来的，如非亲见是不会相信的。这一段的活动，对我这样久蛰南京及经常坐

机关的人来说，真是耳目一新。就在这时，省委通知抽调我厅一名厅级干部去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那时厅里正副厅长共五人，一位是党外民主人士，一位是兼职分管中医（而且是残疾），平时机关内只有三人，除厅长盛立，另一位副厅长是个年老体弱的老红军，而我年富力强，又是分管政工的，无论各方面的条件都应该由我去，这就毋庸议论了。

这期“四清”，决定在昆山县进行，是继句容试点之后，在全县范围内普遍进行的。因昆山为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省委又决定要结合“四清”搞血吸虫病防治试点。我去的陆桥公社，是昆山北部有名的穷乡之一，据县里介绍的情况是“三低”：（1）海拔最低，据说只有2公尺多一点，是个洼塘的底部；（2）产量全地区最低，全年稻麦两熟只有亩产（大田）628斤；（3）人口最低，全公社只有9998人，出生和死亡相抵，好几年没有超过一万。而全公社大田却有三万二千多亩，（自留地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平均每人占有三亩多，一个劳动力要管十亩左右，因此，耕作粗放，产量当然上不去。全公社茅草房占十之八九，大部分是苏北来的移民。公社所在地是一个小镇，民间称谓“撒尿（音施）陆家桥”，意思是撒一泡尿就能跑遍全镇。

我是社教分团团长，副团长一位是姓臧的，原任太仓县委副书记，因太仓已先期搞过社教，他算是老手，故总团打过招呼，好多事情要请教于他；另一位副团长是姓于的，原吴江七都公社党委书记，是一位年龄较大的南下干部，比较谨慎，不大说话。工作队大约近一百人，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有人进驻（小的生产队一人管两个）。除此之外，我另外还带了一个医疗队，有十人左右，是从南京的几个医院抽调的医护人员，另有十余人是南京医学院刚实习完的应届毕业生。

我们进驻公社以后，发现当地干部情绪普遍比较紧张，不敢和工作队接触，但又打听何时开会，何时进城等情况，关注工作队的动态。我采取暂不正面行动，而是先要医疗队开展工作，除了在公社卫生院看门诊外，也有出诊到病家的，成为了解情况的一条途径。正好遇到一家有个病孩，才出生不久，先天性肛门闭锁，以致不能进奶，哭闹不休。医疗队一位姓马的外科主任医师（市一院来的）当即为其做了手术，拉出了好多粪便，就逐渐好转，哭笑如常。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到卫生院来找医疗队看病的人猛增，收益均归卫生院，院长就成为我们的积极分子，反映了很多情况。我又决定先不检查干部的经济问题，而是搞血吸虫病

的普查，通过皮试，发现85%以上的人均为阳性。在陆桥东北三华里的杜家大队（我去蹲点住了一个月），感染率几乎达100%，连一岁左右的小孩均为血吸虫病人。究其原因，是夏天精赤坐在座车内拉屎后，连人带车放到河中洗涤，接触疫水而致感染的。

通过这次普查，进一步摸清了公社各方面的情况，于是才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从公社党委书记、社长一直到各生产队长、会计，会场设在公社粮站仓库，挤得满满的。当我宣布开会时，那种为当地人熟悉的乡音使全场为之一震，出乎大家的意外。因为我家乡离开陆桥大约只有四十华里的样子，（陆桥之东为周墅，之东为湖川桥，再东为毛家市，再东就是岳王市。）尽管出去日久，但操起家乡话来还是很熟练的，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来“整”基层干部的应该是“老侬子”。我侃侃而谈，讲解“二十三条”，结合近一个月来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肯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缺点有错误改了就好。我号召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共同对敌，敌人就是危害了全公社人民的血吸虫病。我宣布了我们准备在全公社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打算，全场气氛顿时活跃。在会后小组讨论时，公社党委书记张文宝带头坦白交待了瞒产私分粮食和多吃多占等错误事实，并表示了要退赔的打算。我们及时找他谈话，肯定了他的表现，还征求他对开展运动的看法。他很是感动，以后经常将下面的情况来向我们反映，成了我们开展工作的助力。各大队、生产队干部回去后，也分别召开社员大会，交待自己的问题。一轮以后，汇报上来的情况是绝大多数都是私分粮食问题，涉及干部的面要将近90%。分团研究，由于陆桥只生产粮食，没有其他产业，所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涉及的面这样广，要作具体分析。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接受老“三反”“打老虎”的教训，不可追逼（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以防出假；二是凡瞒上不瞒下，同社员群众一起私分的，就不作贪污论处，即使干部多分一些，也属于多吃多占，只要本人承认错误，群众谅解，就不予追究。这样，就会使大部分人得到解脱，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要相信社员群众向我们的反映，“我们农村的事，谁家不晓得谁家呀”，所谓“家有黄金，外有秤星”，各家的事，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再，就是“四清”不能绝对化，只能大体搞清，凡事搞个八不离九，也就可以了。本着这些原则，我们公社的运动搞得比较稳，又比较快，也比较实。最后达到“三满意”，即群众满意，干部满意，当然领导也就满意了。

在这期运动快要结束时，苏州地委办公室通知我去苏州开个座谈会，未说会议的内容。到地委招待所报到后，开会时由地委书记储江同志亲自主持，参加的有部队干部七八人，北空空校姓梁的校长，和姓薄的政委，在昆山总团开会时见过，其余不认识。地方干部参加的除我外，有华东农村工作部的孙加诺，南京药学院的李昌文，还有二人是谁已记不清了。会议内容，说是交流学习毛著心得。会议开始时，叶群来参加了，拿出笔记本，一一询问地方干部的姓各单位，仔细地记下每人的发言。我因没有准备，所以只能洗耳恭听。叶群就坐在我旁边，我想起她弟弟叶家桢（叶镇）在二中读书时入党是经我批准的，以后又经我布置撤退至皖西解放区。如果我想和叶群套近乎，她弟弟的事就是现成的话题，但我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没有为日后遭来麻烦。

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花了我们不少精力和时间。省血防所派来一位专家刘惠生主任医师（女），负责指导全公社的防治工作。在普查掌握病情以后，先是挑选了一批病人（老弱妇幼除外），集中在小学教室内，摊草铺，吃公伙，用锑剂二十一天疗法，注意限制他们的活动量，以防出现阿—斯综合症。近两个月治了近百人。随后用锑剂七天疗法治了两批，时间是快了，但效果不如前者。接着南京药学院副院长王殿翔研究的一种口服锑剂片经中央血防办批准，拿来作临床实验，搞了几十例。接着上面又交来了一种由苏联研制的油状口服药（代号为血防846），经试服后疗效很好，且服法简便，颇受群众欢迎。于是就大量采用，由医疗队送药上门，看服下肚。以后工作人员闲下来的也参加送药队伍，只要提一个装药的暖瓶，一个茶杯（标有刻度），走村串户，大约化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将所有病人基本治疗一遍（少数巨脾、腹水严重的患者除外）。到快要结束时，有两位小学教师反映服药后出现黄视、复视现象，说明此药对神经系统有影响。她们都是较高度的近视眼，戴眼镜后出现的。经查并无严重后果。这个情况向血防办做了汇报。因治疗已基本完成，还有几十例就用锑—237扫尾，总计前后合计治疗了六千五百多人。至1966年3月底，工作队及医疗队就全部撤离陆桥。此时全公社人口为10,004人，比以前增加了六人。

同年5月初，我又去常熟搞了一期社教，地点在距城东九华里的兴隆公社。这里为粮棉夹种地区，条件要比陆桥好些，但从常熟全县来看，也算比较差的。公社卫生院很简陋，没有病房，医护人员加院长会计只有九人。我带的工作队已

大换班，原由苏州地区调来的基层干部和知青，绝大多数已搞过二期以上，故予轮换；这次来的，主要是南京空军的干部近百人，另有公社基层干部几十人。当时刮的风已有变化，“清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为“突出政治”所替代。我们一进村，按照总团部署，就组织群众学习毛著，特别是“老三篇”，接下去就是召开讲用会，老百姓看着笑，“你们又搞什么花样了”？当时时时兴的是学习解放军，而空军又是最吃香的，所以我们来的南空干部，很是神气。有一个排级干部小青年，在讲用会上“把自己摆进去”，“把丑思想亮出来”，说自己在河边洗漱时，还用香皂擦自己的脚，真是资产阶级思想到家了，赢得了大家的鼓掌。就这样把自己作践一番，被评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整个运动的部署经常变动，还没有清经济，“五一六”通知传达了，接着又出现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不断变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红卫兵运动掀起后，到处串连，接着发生了“王敬先事件”，苏州的冲击波立即传到常熟。

王敬先是苏州地委副书记，是这期社教团的总团团长，来苏州前是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苏州市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连，在中南海抄阅大字报，发现有几张大字报揭发王敬先等人“谋害”毛主席，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立刻传到苏州，引起极大的震动。红卫兵们根据大字报的内容，公布了王敬先的“罪状”，并揪出批斗，直至动武。省委要省公安厅“拘捕”王敬先，先押回南京隔离审查，实质上是保护起来。常熟的社教运动处于混乱状态，已有几个分团团长的被打成王敬先的“黑爪牙”加以批斗。苏州地委乃决定将全部工作队员调回苏州“集训”，部队来的干部除留少数骨干外，大部分都回原部队待命。我带的工作队，南京来的留了两个团干和十几个营干，其余全部回了部队，另有地方来的约六十人，一同到苏州，住在沧浪亭南边的市文化宫内，就在游泳池水泥地铺上厚稻草作垫，排头而卧，像沙汀鱼罐头一般。所谓“集训”，也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只是读读每天报纸上各地的消息，和交换各自听到的传言。

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南艺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文化宫工作的学生金敬熹，他告诉我许多有关苏州市“文革”的信息。我还隔三差五到察院场去看批斗会（一般都在晚上），造反派组织群众批斗苏州市领导人李执中、朱启奎。批判所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时很像后来所说的“逍遥派”，一身轻松，还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在“见习”，日后也要轮到这类待遇。大约一个多月后，苏州地委

通知各分团回常熟做结束善后工作，我决定在苏州的各大队留下一至二名负责人，其余就地解散回原单位。我带了这二十来人再回常熟，除分团四人外，其余分别回到各自的大队，因这期运动并未实质性的开展，所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束工作要做，只是向所在地的干部群众话别而已。至1966年12月底，我们都撤回常熟县城，在县委二招住了两天过的年。当时县委书记汤熹成已被当地造反派批斗多次，所以我们也就各自回家了。

我回到南京正值“一·三”事件刚过，造反派在江苏饭店武斗，攻打了“工总”的许多人。此时省委已经瘫痪，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我回到卫生厅时，看到已被各地来的造反派包围，但他们不认识我，所以我就可以直进直出。我在厨房里看到炊事员顾金寿，还有一个师傅姓叶的，是对门社会哲学研究所来的（两个单位靠近，合在一起开伙），从他们那里了解，厅领导已不知去向，只有办公室主任顾少初和人事处长陈瑛在“顶”着，各地来的人向他（她）们要吃，就每天24小时开伙；向他们要钱，说是要到外地去“串连”，他们被逼得没法，就批一下，让计财处发一点钱。我进去看到陈瑛，找间隙她告诉我，省委已转入地下，让我到总工会附近（定时）找到孙伯菁，或许可以找到省委。我去了两次，居然找到了。孙是省教育厅副厅长，我是认识的，他跟我约了时间、地点，下次再见面。这一套地下工作的做法，想不到又用上了。他告诉我他也不能直接找到省委负责人，要通过一个叫徐慧征的女同志（时任南京大学某系的总支副书记，后来才知道是机关总党委书记王维良的夫人）才能找到，但过了几天，仍然没有找到。

1967年1月26日，省委被造反派“夺权”。1月28日，省卫生厅也被造反派“夺权”。当时没有被羁押的处以上干部均被喊到大礼堂“观礼”，有个造反派头头跛着脚，把头上戴的帽子脱下来装了“夺”来的图章（厅机关和各处室的共约二十多枚），连连晃了几下，算是“夺权”成功。从此以后，下面来省里造反的就不再找旧的当权派，而是直接找造反派头头，局面更加混乱。随即实行军管。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即所谓“屁派”和“好派”。

此时，常熟的造反派来要我们工作队回去检查所谓执行了资反路线。我当即决定部队干部一律不再去常熟，地方干部每个大队去一个大队工作队负责人（大都为苏州地区的公社党委书记），一共不到二十人，通知他们到苏州集中后一起重新回到兴隆公社，各就各位，和当地造反派取得了联系。因为我们这期社教运

动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开展，所以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冠冕堂皇说上几句，也就过关了。我就让各大队的人陆续撤走，我一人掩护最后走，已是1967年3月中旬。镇上的造反派头头是个小学教师，姓金，我和他已经混熟了，临走时，他送我进城，一路上随便聊聊。我问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回来，他说地方上有人说他们这一派不积极，所以不得不来一下。我问他对我有何观感，他说我好像一条鳗鲤，滑溜溜的抓不住。我笑着说，我本来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可抓嘛。到了县委二招，他要所长给他打了个收条。我有点诧异，问其原因，他答称在卫生厅把我领回常熟时，也是打了收条的。此时我已预感到即将享受的待遇了。

回到南京，厅里也已经军管，但当时要建立所谓革命政权，必须具备“三结合”的条件，即“军代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厅里两派都向我表示好感，有的派我熟识的人到我家进行试探，有的直截了当地要我“站出来”，我对此均予慎重对待，未置可否。后来厅里要召开计划生育会议，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我就应允了。1967年10月，这次会议要在镇江召开，我也随同去了。到镇江后的第三天，会议还没有开始，厅里打电话给军代表，说南京艺术学院的造反派要求我回该校检查，已经省军管会同意。

我即回南京，由南艺的造反派带回学校，从此开始了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羁押生活。先关在丁家桥原址音乐系的琴房内，后改至黄瓜园新校舍美术大楼。不时有人来外调，要我提供别人的情况。还有学生来找我谈话，问我是倾向哪一派的，对此我一律答称我不属于哪一派，逼得紧时则答称是“当权派”。随着所谓揭批文艺路线的发展，南艺的形势日益紧张，关进“牛棚”的人不断增多，而我则逐步提升为南艺执行文艺“黑线”的总后台，而其“罪证”则是那份“四年总结”，被称为“修正主义的黑纲领”。批斗了几场之后，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就安排体力劳动以示惩罚。先是在校园里与大伙一起移植树木，后来和李长白教授一起分在锅炉房劈木柴烧开水。

此时，来外调的人日益增多，调查地下党员情况的有之，调查解放区和解放军来的干部的表现和受处分情况的亦有之。我逐步发现来人一般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们想要“打倒”的人，尽量要我提供坏情况；他们想要“结合”的人，尽量要我提供有利于本人的情况。我逐渐悟出了应对的规律：凡是来调查地下党

员政历的，我都一一认真回忆，力求还以本来面貌，经我手打入到敌人阵营的，如国防部二厅、中统（包括有一个还进了高级党网），有的在三青团内担任了区队长以上职务的，等等，我均予以实事求是之证明，决不推诿。还有 1948 年下半年几次大逮捕后组织撤退，当时这项工作总的由我主持，自己手上掌握了好几条交通线，所以来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也很多，关键是要查证是否由组织上要他撤退，去哪条路线等等，我均仔细回忆清楚给予证明。但对来了解有关干部解放后情况的，我则一概答称记不得了，要他们去查档案。因为我解放后在组织人事、监察等部门工作了十来年，造反派把我当作活材料篓子，想从我这里挖一点干部情况，特别是受党纪政纪处分的情况。而我则已意识到决不“抛档案”，因为这是违反保密规定的。为此，造反派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批斗会，批我“狡猾”：你对地下工作的情况记得那么清楚，而对解放后的情况却一概记不得了！这不是存心和造反派作对吗？我辩解说，在地下工作时，是不允许存有片言只字的，当时只能记在脑子里，如不记清楚，那就会耽误了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所以记得非常清楚。而在解放后，地位不同了，我当官了，所有干部的情况都有文字档案，我要了解谁的情况，我都喊机要员把档案调出来，看后仍旧归回去，如要再看，就再调出，用不着记住，当然就不记得了。对方也就无话可说了。

1968 年 5 月，两派武斗，一派原来已占据美术系大楼，另一派则控制了音乐系大楼。有一次喊被关的人去劳动、搬砖头堵塞窗户时，我就跟李长白打个招呼，“我们还是去烧开水吧，以便供全校的人饮用”。到了开水炉前，我告诉他，帮一派的人去“修工事”，另一派肯定不依，要吃亏的。果然不出所料，半个小时后，那些去搬砖的人都被打了。然而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能逃过挨揍的遭遇。6 月初，校内两派均撤离学校，清静不了两三天，又都先后回来，一派引进了电力学校的“反到底”，一派引进了机械学校的“东方红”，都说要揪出总后台。可能是受人唆使，有个学生随手把我从人群中拖了出来，举拳就打，有个南艺的学生挡了一下，厉声喊我跪下，我乘势蹲下去，那个打我的学生就用膝盖在我的肋间使劲顶了几下，随即被别人劝开了。第二天我向看管我的学生（郭普，印尼归国华侨）请假要求看伤病，他很同情我，答应了，但规定“三不准”：①不准说挨打了；②不准到大医院去；③不准回家，当天返校。我于是到市级机关门诊部，想如遇到熟人可给公教一村家里通个气，但没有遇到什么人。直接到放射科要求

胸透，医生有些面熟，但叫不出名字。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谎称马路上修树，一根树枝砸下来打伤了。透视后他只说问题不大，给我开了一星期的病假。回校后还真给休息了一周，才又去“上班”烧开水。后来又遇到了那个放射科医生，他说当时就知道我挨打了，哪有6月份修树枝的？

1968年9月下旬，工宣队进驻学校，就把我移交给卫生厅，关在保泰街机关大厅后面那个小房间内。国庆节那天上午，宁儿送来一瓶咳嗽药水（实际上是一瓶白酒，兑上棕色合剂，以掩耳目），晚上就独坐在天井里听放焰火的响声，边喝边听，自得其乐，就这样过的国庆节。

不久，整个机关下放到金坛实行“斗、批、改”，到了朱林公社靠公路的一个大队，我们几个人住在李根宝（贫农）家里，除我之外，还有“造反派”头头周维高、封于敦，“革命群众”赵振奎、刘洪玲，其中，封实际上已被另一派软禁，我则是明显被囚禁的。伙食搭在李根宝家，名义上是同吃同住，实际上我们几人单独一桌吃。李发现我不大吃菜，曾私下要我多吃菜，注意身体。晚上，造反派找贫下中农代表开会，介绍来人的情况，会还没有结束，李根宝就回来了，见我一人在，他轻声告诉我，你不要急，你的问题难摸呢，不像有些人那样明白肯定。第二天他进城，临走时向我要了一点钱，代我买了一套特大的餐具，瓷碗、瓷盆，还有一只大号的铝调羹。吃饭时，他替我盛满了饭菜，要我另坐到门槛上吃，“不许上桌”！我却一个人吃得舒坦。大约隔了一周时间，卫生厅和科委合成一个大队，起了灶，一起开伙，就不在贫下中农家吃饭了。但一百多人开伙，当然没有食堂，就各人用餐具打饭吃，我这套餐具这时派了大用场。还是那个炊事员顾金寿，因为在造反派包围卫生厅时我曾去食堂慰问过他，他对我有好印象，但此时不能流露，他就拿我的炊具打好饭，狠狠地指着那灶后的树桩：“坐到那边去，老老实实地吃！”坐定后，我一翻，饭底下藏着一大块肉呢。而且当时天气已冷，而灶内余烬尚存，我顿时感到一阵暖意。这套餐具，一直跟着我下干校，去泰州，回南京时还带着。但因搪瓷破损，故而废弃。只有那只大调羹，至今仍在用着。每当早晨吃牛奶早餐时，就会想起那段挥之不去的经历。

在金坛呆到春节前，全部人员都回南京过年，我们几个被幽禁的人集中在草场门电校内，开放了两间教室，就以讲课的踏板作铺。记得仪征和小顺曾来探视，不让见，正好我走出去，见到了，但旁边有牢头禁子监控，不能单独谈话。据说

小顺还为此伤心，“不能参加红小兵了”。

开春以后，又下农村，到了句容县下蜀公社，驻桥头镇，此时宣布成立“五七”干校。我被编入一大队三连，（凡被审查的对象亦均编入连队，但不是“五七”战士。）政历问题一直“挂”在那里，无人过问，只是安排体力劳动。开始拉了一段时间板车，为干校造房运砖，我对拉板车是从头学起的，后来能熟练地驾辕。关键是装车要得法，重心恰当（要在两轮轴心上方略偏前），如太前，驾辕的人就吃力，但如“后重”，就会“钓鱼”，会出事故的。装车装得好，驾辕的人就省力，只要把住方向，由两边的人拉着向前走就行了。每车装红砖150块左右，约500多斤，从高资到桥头约五华里，每天来回三四趟，别人来卸车时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每天吃粮一斤半以上，外加两个馒头装在口袋里供在路上垫饥。

大约过了半个月，砖已拉尽，休息几天后，连队要我去管菜地，说我是学农的，当个蔬菜班长吧。下面组员都是一些高官夫人，记得的有李士英的夫人王云，陈光的夫人陶云霞，管文蔚的夫人朱竹雯（时间很短，她就调到蚕种场去了），烈属庞露，另配一个壮汉方伯元，要他挑水、挑粪的。还有一个男的，姓仇，是个牢头禁子，不劳动，专门监视我们，还经常恶作剧。记得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说自己是贫农的后代，就看得不得你们这些人，把半桶粪拿来，要那几位女同志轮流来搅，搅成糊状才能兑水下地，“验收”几次，都说“不合格，还要再搅”，以此来消磨时间。但总的来说，由于大家的努力，水肥管理得当，收成还是不差的。送给食堂，贴补伙食，对改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年夏天，小红和小苹两人曾来桥头看我，因我正在农田劳动，她们就在镇上一家店铺前台阶上坐下等我，见到后得悉家中各人近状，悲喜交集。

当时已掀起干部下放潮，动员过两次。记得汪青辰才“解放”，就上台抢话筒表态，临走时带了大红花。干校当局这样安排，无非是给尚未解脱的人一个信息。而我因长久“挂”起，一直没有说法，所以有些麻木，根本不作此想。风传南京地下党是个“大专案”，长着呢！有次我到校部去，遇见时任干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如光，他原是药政局副局长，很熟悉的。他一见我，见旁边无人，就轻声说：“老盛，你不要在意，没事的。”我没有懂他的意思，还往前走。他喊我站住，轻声说：“现在《沙家浜》不是照唱吗？如果我在审干，还要审查审查阿庆嫂同胡传魁什么关系呢。”此时校部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沙家浜》阿庆嫂唱的“风

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那段二黄慢板，正与我的心境黯然神伤发生共鸣，而熟人的好言相劝，又使我感到宽慰。

年底前，得仪征来信，说市里已决定她下放沭阳农村，小苹与小顺随行。1970年1月中旬，连队正式告我此事，并说可到南京探视送别，但不同意我去淮阴。回南京后，先到公教一村36楼，看看我们已住了十多年的旧宅，行李已扎捆。除了被褥箱笼及床铺外，全家限带一张方桌，每人一张木椅，几经交涉，才又增带一个三屉柜。其他家具全部交公。室内残巾废纸满地狼藉，一派衰败景象。更有甚者，原来说好留一间房给我落户，现在根本不提此事，无奈只能将她们已迁出剩我一人的户口簿揣在怀中。

装车开走后，我们就到鼓楼一个招待所（妇女百货商店楼上）包房住下。小红当时已插队高淳，亦回来送行。一间房，六床铺，空一张正好放随身物品。第二天一早，昨天装好的卡车来了，同行的一家是我熟悉的潘光夫妇，另一家不认识。目送仪征等人向西往大桥方向驶去。因时间尚早，就同小红到鼓楼广场闲逛，顿觉胸闷难过，就到鼓楼医院诊视，做了心电图，发现st波下沉0.1mv，这是迄今为止我心肌缺氧最严重的一次。（以后每次检查，一般都是为下沉 $\leq 0.05\text{mv}$ 。）说明当时所受创伤之深。

回到桥头干校，得知像我这样户口本揣在口袋里的，还有原教育厅副厅长孙卜菁，他的夫人下放射阳县农村，他也受了机关行政事务局的诓骗。这种搞行政事务工作的，狗眼看人低，仗着新贵权势，乘机落井下石。连原省委书记陈光和夫人，也被他们驱赶到太平南路一家临街的楼上两间小屋内居住，而原在颐和路的住宅则供奉给新的省革委会头头了。自从我的户口簿揣在口袋里以后，被人讥为“黑户口”，我竭力辩解，笑言“我是有口无户”，门户没有了，但口粮还是有的。每逢月底过“大礼拜”时，朱朱同志回南京，就代我到和平路粮店里领取粮票和油票，回桥头后给我交给食堂。这样的待遇，一直到我分配工作离开干校。

1969年11月下旬，一大队举办读书班，要我去参加了。从找出的笔记本看，11月23日晚开预备会，读书班开学，记不得谁做的动员报告，强调阅读马列原著，要一本一本地学。而过去只是强调学习毛著，结合学习马列，我感到形势似乎有点微妙的变化。首先学的是《共产党宣言》，以后又学了《哥达纲领批判》。开始集中学习一周，大家正襟危坐，自己看书，不苟言笑。随着禁锢渐开，就各

回自己的住处“自学”，以后回家的人多了，就带来几本“杂书”，互相传阅，因此，在我的笔记本上就出现了“燕霜”“齐电”等字样。据后来了解，补述如下：

“燕霜”见《论衡·感虚》篇：“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这个故事写的冤案，较之关汉卿的《六月雪》，要早千年左右。

“齐电”见《淮南子·览冥训》，“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高诱注云：“庶贱之女，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益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怨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齐）景公之台。陨，坏也；毁景公之支体，海水为之大溢出也。”这个故事，抒发了更大的愤懑，矛头直指高层！我当时看杂书时对此甚感兴趣，大概跟心境类似有关。

1970年1月25日，大队领导布置每人要搞思想小结，说什么“党组织生活停止以后，全靠自己游泳，有的干的对了，有的干错了，小结一下经验教训；组织上也有个了解考察的意思，便于更好地了解和使用”。

小结交去以后，至3月中旬，就莫名其妙地通知可以恢复组织生活了。生活起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体力劳动早已不干了。唯一改变的是可以参加打扑克牌了。用当时的“行话”说，叫做搞“一打三反”，即每天打一次牌和吃三顿饭。后来打牌的次数增多了，美其名曰学习“54号文件”（不带大小王就是“52号文件”）。这就是当时干校的一段闲适生活，时间稍长，就感到非常无聊，但何时分配工作，还是杳无讯息。特别是我住在蚕种场大厅内，三间大屋，空无他人，每当长夜独坐，月照中庭，思念亲人，分散各地，正是“一夜乡心五处同”：宁儿在城西湖，小京、小元在淮安，小红在高淳，仪征同小苹、小顺在沭阳，我在句容桥头，不正是五处吗？思前想后，难道我就这样了此残生吗？我才不到五十的人啊！

后来，通过熟人问讯是否可能分配工作，答称还要“研究研究”，我于是要求去沭阳探亲，获准一周假期。我于傍晚坐火车到南京，这里已没有家了，住在省招待所，遇见一位姓朱的所长，熟识的，托他订了翌晨到沭阳钱集的早班车，并给家里发了电报。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车到钱集，苹苹和小顺已在等候。他们两合骑一辆自行车来的。于是三人缓步东行，往陈圩再向东北至张圩地界，到路东生产队。我们家暂时安置在一个山芋窖内，原是看窖人住的一间房，放上床

铺后，甚是拥挤，许多箱笼还未打开，就在缝纫机上放上煤油灯，作为酒案，也是书案。在家呆了五天，就要往回走了。那天几乎半夜才过就起床了，因为要赶头班车，当天才能凑巧到桥头。我出门后，仪征送了一程，当时即景口占一绝：

早发张圩

才得相逢又别离，依依相送过村西。

临歧执手黯无语，残月在天鸡乱啼。

这个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从此以后，每隔三个月左右就这样跑一次。一次算是探亲，三次就请事假。探亲路费可以报销，事假就自己掏钱。每次都是先到省招待所住一元钱一个晚上的统铺，请朱德禧副所长事先订好第二天到钱集的车票，拿到票就打电报给张圩，以便第二天有人到钱集接。就这样循环往复过了近三年。原住的山芋窖已倒废，又在机房过渡了约半年，才搬进了专门为我家盖的新居。

张圩每十天有两次集，每逢赶集就有荤菜买卖，当地农民不吃排骨，我们就整片的买回家。鸡子开始时论个卖，约二元钱一只，后来农民懂得论斤称了。很少吃到鱼虾，有时回家时没有下酒菜，冷天就是花生米，夏天有时小顺拿个电筒去捉田鸡炒来吃。养了一只黑猫，乌油滴水，非常可爱，能扑杀麻雀吃，也常常扑杀邻居的小鸡，害得仪征去赔礼赔钱。最滑稽的是它能自己开橱门（有搭钩的），我回家时常煮个鸡，我吃个鸡腿，它也是自己能开门吃个鸡腿。还有更好玩的事，它会在池塘边钓鱼。傍晚时分，它稳坐在池塘边，背对水面而微侧，把尾巴伸进水面，整个身子和大部分尾巴都一动不动，若无其事，而在水中尾端则轻轻晃动，斜眼偷觑，有泥鳅之类前来舔食，稍一咬住，就被它用劲一甩，鱼就跌到岸上离水面七八尺远的地方，它就上前咬住，拖回家食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这样描述很难使人相信。

清明时节，我曾在干校田边收取荠菜籽，用试管装后带回张圩，撒在自留地上，秋后出满荠菜，挑来包饺子吃，开人工种植野菜之先河。又经常买几百斤煤屑，借来模子打蜂窝煤。打好的煤基都放在塑料布隔过的地上，如不隔就会吸潮压塌，可见住房内湿度之大。但这座房子也有它的优点，草顶土墙，冬暖夏凉，

在当地人的眼中，这已是不差的住宅了。

1972年2月4日，是我的五十周岁生辰。那天正好回家，车才过大桥，下起漫天大雪，能见度很差，车行很慢。车过汉涧，雪下得更大，车轮多次空转，无法行进，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等着。好不容易又前进了，进进停停，过洪泽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又停了好久，好不容易到达淮阴，说是不走了，车上好多人有骂的，有求的，驾驶员算是好心，终于又开车了。我是耐心等待，车到钱集，早已转黑，下车的除我一人外，还有个木匠，背着工具，我问他到哪里，说是到陈圩的，就结伴同行。走了约十五华里，他到家了。分手时，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闺女庄，他指了东北的一处，隐隐的灰影，说“鬼脸庄”就是那个方向。我借着雪光，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前行，不管是沟是坎，都已经没有水了。大约八点左右，我终于到家了。小顺说，在钱集等我到五点多，站上的人说今天没有车了，所以没有接到。坐定不到半小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小京和小元合骑一辆车来了，他们从淮安仇桥大队插队的地方吃了早中饭过来，一路跌了好几跤，总算到家了，那副狼狈相，就像越南战争中9号公路下来的逃兵。总算到了家门，仪征忙着做饭，小苹那时已在塘沟中学上学，不在家。就我们五个人算是团聚了一次。

1971年夏，连队分配我一个临时性工作，到一个小分队当材料员。所谓小分队，实际上就是审干小组。分队长是沙伯良，原省总工会的一名科长。审查对象是原省委书记的一位秘书。当时正在大抓“五一六”分子，这位秘书也是作为“五一六”嫌疑分子而被继续审查的。接过两大口袋材料，一包是本人多次交代检查，一包是别人的检举揭发和已经取得的旁证材料，我一页一页一字一句仔细看了，觉得案情并不复杂，文革初期的擅取省公安厅档案等错误，证据确凿，完全可以定下来；只是所谓“五一六”一事，本人坚不承认，旁人提供的材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倾向于排除，沙伯良开始有些犹豫，亲自找审查对象谈话，亦无结果。他又想将此问题挂起来，我不愿意在报告上签字，他就同意了我的意见，予以排除。报出后获校方批准，此人终于解脱。后来知道，同案的另一名秘书因小分队坚持不放，又拖了一年多才获解脱。

1972年5月，仪征到干校来住了近两个月，当地人说她是出外“跑麦反”。跑反是逃难的意思，因每年麦收时节，她的哮喘病总是发作得很厉害。1971年

麦收时节，她老病发作，当地卫生院治疗无效，几至不起。幸亏一起下放的钱瑛同志（时已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从陈圩回张圩，途经我家，发现她病情危急，喊了四名农村青壮年劳力，将她抬送钱集，赶上末班车，到沭阳县城传染病医院。任素茗同志在那里将她抢救，才幸免于难。这次来桥头，因我住在蚕种场内，四围都是桑园，附近又是茶场，空气很新鲜，加之情绪比较好，所以这个夏天基本上没有发病。

1973年2月，连队通知我分配我的工作，大队领导罗文治（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找我谈话，说分配我去泰州的江苏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任革委会副主任，我想，在干校的羁留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我向罗文治提出，要把洪仪征也调往泰州分配工作，他也同意了。后来我知道，凡是分配到中小城市工作的，全家下放的，才可以回来，如到南京，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在干校等了约一个月，得知洪的调动也可以了，就拿了介绍信去泰州报到，转了户口，揣在怀里的户口终于有了着落。洪的关系由她自己去跑，时任淮阴地委副书记田蓝田和时任扬州地委副书记周兴都给予一定的帮助，终于也办成了。扬州地委分配她到泰州市财政局任副局长，小苹、小顺和她一起到了泰州。当时小京和小元已从淮安迁到了沭阳，故仍住在张圩。我们四人在皮研所宿舍住下，分到31.5平方的一间半房间，在全所算是最大的了。从此，我就在泰州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将近五年，成为除南京以外住得最长的城市。

大概就在“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把经过多年酝酿的一首小词写了出来：

浪淘沙·溪水

溪水语潺潺，
度壑穿山，
云深雾重万千湾，
激浪飞花终有信，
迎得潮还。
碧玉泻平滩，
彩照尘寰，
奔腾应识远征难，
且喜涓涓流不尽，

胜似狂澜。

南艺有人来看我，看到此词后，颇为赏识，把它登在南艺的院刊上，后被江苏的一家文人刊物又登载。登出时，编者擅自将词中“语”字改为“响”字，我看到以后不能认同。“语”字是拟人化的，“响”字那是造反派喊口号了，所以我定稿时干脆把“语”字改为“诉”字。最后的“胜似狂澜”改为“何必狂澜”，就把彻底否定“文革”的意思也包含进去了。这首词不光是我对十年动乱的感受，而且也是与我几十年“历乱认前程”的经历相吻合的。❏

【述往】

我所亲历的“清查516”

林 海

我从农场出来之后，分配到了甘肃省东南部的武都地区电管站工作。单位不大，只有十几个人，基本上都住在单位里。车间和办公室南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西边一排三间房，每一间大概有12平米。

我住在南边的房子里，一门一窗。窗户下面放了一个痰盂，是我买来准备当作花盆种花用的。住在中间的是王师傅。王师傅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写得一手好字，待人也很实诚。北边住的是李献彩一家。李献彩家有一个老人，三个孩子，再加上他们两口子6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这两口子经常吵架，孩子们也时不时在院子里拿别家的劈柴青菜等东西，所以我没有到他家里去过。

老站长调走之后，电管站来了一个新站长，叫做李沛田。李沛田家也是6口人，住在办公室后院的一排房子里，有两个大间，门前还有一个小厨房。过了没几天，李沛田叫来工程队，把小厨房拆了，翻盖成一间又能住人又能做饭的较大的房子。

每天上班之后都要先开会政治学习，“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沛田动员大家发言，说了一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套话。“引蛇出洞”的“阳谋”咱也是知道的，没怎么太当回事儿。

我说：“李站长，我给你提点儿意见。你的住房已经不错了，还用公家的钱

翻盖厨房。李献彩一家也是6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你也该关心关心职工生活困难。”

李沛田的脸“夸”地一下掉了下来，沉吟半天没开腔。最后说：“啊……好好好……提意见，提意见……散会，散会！”

不久，“清查516”运动开始了。一觉醒来，发现院子里贴上了大标语：“把516反革命分子林海揪出来！”我肚子里感到好笑。

开会了，我站在中间。看平日要好的同事，有的低着头，有的把脸别到一边，也有的开始振振有词地“批判”。李献彩跳得最高，扯着嗓子喊“打倒516反革命分子林海！”气氛渐渐高涨起来，大家也跟着喊口号。

李沛田目露凶光，要我交待“516罪行”。政治运动整人的那一套，无非就是先扣上大帽子，再整你的材料，然后诱迫你交代认罪。有几个同事念批判稿，抄了一通报纸社论，我听着没什么劲儿，就站着开始练气功。倒是有一个叫做刘兆奇的同事，说我“死不交待”是“背着牛头不认脏”，我觉得说得有点儿意思。刘兆奇是唐山人，我在捉摸他说的是唐山话还是武都话。小时候我在唐山住过，好像没有这么骂人的。

说我是“516反革命分子”，唯一的根据是我是清华的，从北京来的，有枣没枣三杆子。我想到我的同学好友，而今是天南海北，此时此刻可能都在挨整呢。正在我浮想联翩之际，一个叫做高启荣的青年工人终于抛出了“重磅炸弹”。

高启荣“揭发”我在办公室一张旧报纸上写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字。我想起确有其事。几天前，我借了王师傅的笔墨，在办公室里找了些旧报纸练大字。没有字帖，信手乱写。我记得写过“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还写过“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等词句。这也成了“516罪行”？

高启荣叫道：“林海！你要拿你的血荐什么人？你是赤裸裸的阶级仇恨！这是阴谋反革命复辟！”会场一下子炸了锅。同事们面面相觑，害怕了起来。刘兆奇领着大家高喊“打倒516反革命分子林海！”的口号，李沛田微微矜笑，得意斩我于马下。

念完“批判稿”，高启荣和李献彩上来，要给我来个“喷气式”。我大喝一声：“高启荣！你好大胆！”这两个人一下都愣住了，会场的气氛也马上凝固。

我决定无耻地展开反击。

我指着高启荣的鼻子说：“你知道‘我以我血荐轩辕’是谁的诗？我告诉你，这是鲁迅的诗！你污蔑攻击鲁迅，你就是反对毛主席！”可怜高启荣吓得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往后退。我逼近一步，喝道：“把发言稿留下！这是你现行反革命的罪证！”

会场形势急转直下。李沛田急忙宣布散会，叫李献彩等几个人把我押回我的宿舍。到了我的房间，这伙人把我切菜的刀和劈柴的斧子都搜走了。我坐了下来，想到一个人在这个无耻的世界上，要怎么无耻地活下去。

接着，他们用大字报把我的窗户糊了个严实。我看不见窗户外面，他们也看不见窗户里面。过了些天，我发现糊窗户的大字报抠了个小洞，大概是想监视我吧。我透过小洞往外看，正看见李献彩的小儿子手里拿着一块石头蹒跚地走了过来。这小家伙走到我的窗户台下，“哐当”一声把我准备种花的痰盂砸成两半儿。

我打开门，骂了声“小兔崽子！”小家伙一边跑一边回头，眨着坏坏的小眼睛。我关了门，想起鲁迅写的，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片苇叶，嘴里喊着“杀！”我感到很悲哀。

后来武都地区搞载波，碰到了一些技术问题解决不了。带队的地区宣传部的钱荣贵，通过地委把我放了出来。我坐车到了康县，几个技术人员说载波功率发送不出去，他们搞了好多天，有人都病倒了。我测量了一下发射管的工作状态，把帘栅压从180伏调高到240伏，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钱荣贵是江苏人，说：“什么516？都是老球蛋！”我在钱荣贵的手下，跑过康县、成县、岷县和宕昌县，虽然辛苦，倒也快乐。后来李沛田调走了，钱荣贵做了站长，老钱待我还真不错。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离开武都，全站的同事都来送行。李献彩跟我道了歉，说：“老林你别嫉恨我，当时我也是没有办法，房子的事情你为我说了话，我没有办法！”我握着他的手说：“没啥！”隔年，我从北京回到甘肃看望当年的同事，往事已成笑谈。去年我又见着了老钱。老钱老多了，他说刘兆奇成了他的儿女亲家。只是“老球蛋”的口头禅依然故我。❏

【访谈】

李春光：没想到中国变成今天这样⁸

文 静采访/整理

一

我的父亲李一平是 1904 年生人，年轻时候参加大革命，包括北伐等等。但是他看到了政治的污浊、充满了血腥，“国之不国，人之不人”，于是在庐山办学。像徐悲鸿、陈散原（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也包括熊庆来、李四光等等，他们都非常熟悉，黄炎培还亲自去考察。

学校办了八年，蒋委员长去了，请他讲学孔孟之道，我父亲很不客气，说：“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钱，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谈孔孟之道。”于是拂袖而去。蒋立刻下了指示，说他“聚众讲学，图谋不轨”，把学校解散了。那是 1937 年的事，散原老人病榻上给我父亲写信，说：“豺狼当道，时日曷丧！与汝皆亡！勿为此戚戚也。”若干年后我们到北京，陈家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家家具破旧，很多都是散原老人的遗物。

1938 年，父亲带着我哥哥和我妈妈，别人给了他一些钱，这才到了上海。然后坐船到河内，辗转到了云南，在家乡办了一所大姚中学，现在叫“大姚一中”。后来，龙云也知道了我父亲，于是召见。结果我父亲当面告了龙三公子一状，那是当地出了名的恶霸，没人敢惹。龙云觉得很奇特，因为大家都说他儿子怎么好、怎么有出息，只有我父亲讲了很多他看到的问题。龙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最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父亲拒绝做官，最后只接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这么一个职位，而且不拿一分钱。我父亲说：“我知道，如果接受了他的钱，就

⁸ 李春光（1940—2017）：祖籍云南大姚，1958 年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文革中，是学校造反派组织“北京公社”核心成员之一，以敢讲真话而出名。晚年旅居美国，因车祸客死他乡。

会失去他对我的尊敬。”

从云南出来，我们在香港住了三年。后来龙云也躲到香港，住在龙大公子家，周恩来就希望我父亲能做龙云的工作，促成云南和平解放。记得龙云当时有一句话，问我父亲说：“你去不去？……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那时候，我父亲本不准备去北京的，但是他说：“那好，我去。”就这样，陪着他到了北京。龙云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后来给他的地位相当高，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于军委副主席。我父亲作为教育界的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政协。

1950年，有一次董必武请我父亲吃饭，说要安排他当云南省副省长。但那时候，我父亲什么都不愿意做，引《庄子》里的话，说：“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就是说，没我什么事了，你们那套我不懂，我的那套都过时了，只想做一个闲散的人。董老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人都要有个组织。”最后让他做了国务院参事，并且要给他一座王府，被我父亲拒绝了。

那一年，我们举家搬到北京。汤用彤跟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说：“既然你来了，一定要和我接邻而居。”汤家在小石作，那是很短的一条胡同，大概总共十三号，汤先生就一家家问，看谁家可以租。后来我们住进小石作二号，就在汤家的对门。但是家里人多，不够住，汤先生说：“我这儿有空房，到我这里来。”老先生、老太太住北屋，汤一介住西屋，我和我哥哥就常年住在东屋，还参加过汤一介和“黛子”（乐黛云）的婚礼。那次挺逗，来的人非常多，有人称赞他们，说：“一个是青年有为，一个是有为青年。”我们就搬个小板凳，坐那儿看热闹。

二

在香港时候，我上的岭南小学，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有个老师叫刘慧娴，当时在那儿教音乐，后来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第一任校长。她说我的音乐感觉很好，每到圣诞节，常常让我当领唱，后来就教我弹钢琴，分文不取。所以我学琴很早，大概六七岁就开始了。

搬到北京，我是在孔德小学读书。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办“少年班”，第一届是刘诗昆他们那班，小学四年级就可以去报考。有的人什么都不会，五线谱都不认识，但是乐感好，也考上了。父亲觉得我太小，不放心，等第二年我的一个舅舅到了天津，将来有人可以照顾了，这我才去考。那年我十二岁，刚好六年

级毕业。

那一次，北京报名的有一千多人。先笔试，放一台也不知什么机器，比如两个音，问你哪一个音高。开始很简单，但音的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比半音还小，就是要考你对音高的辨别能力。然后口试，黄飞立老师是我的考官，让我随便弹个什么。当时也没说拼命准备之类，都是有什么就弹什么。然后让我背过去听句子，然后是打节奏，他拿个打火机在钢琴上敲，让我重复。那次北京取了十七个，发榜一看，呦？有我。也没高兴，也没不高兴，这么就去了。

钢琴是我的主科，但进去没多久就发现，我不能学钢琴，为什么呢？因为刘诗昆是钢琴家。虽然这个人不怎么样，在有些事情上，他就是一个恶棍、是个流氓。而且，这个人对政治贼感兴趣，有着一颗莫名其妙的政治野心，但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文革时候就胡作非为。尽管如此，刘诗昆依然是个天才，很少见、很少见。上帝给了他一双极灵敏的耳朵、一双极好的手，几千万人里也找不出第二个。十七岁在匈牙利“李斯特比赛”上得了三等奖，赵汾就说：“多少年之后，匈牙利的教授们还对此愤愤不平。”因为一、二等奖是给苏联“老大哥”和匈牙利人的，三等奖才轮得到刘诗昆，为了补偿一下，还给他个“特别奖”。刘诗昆非常适合弹李斯特，因为它非常华丽，叽里咣啷、叽里咣啷，那东西对他不在话下。他的老师是海归，从巴黎音乐学院回来的，不过琴弹得并不好，一场音乐会都开不出来，法文大概也不怎么样。所以刘诗昆根本看不上他，平时不练琴，整天胡玩儿，但是他可以百发百中，不弹错音的。那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天才，让我一天练二十五个小时，一百年我也练不成刘诗昆。

但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除了音乐，我也喜欢诗词歌赋、喜欢古典文学。三岁会背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另外我还喜欢历史，没事儿就到旧书店里乱翻。有一次翻到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就把那书买回来，后来知道叫《古文观止》。那篇文章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虽然有好多字不认识，但是我能感觉到文章之美。我还默写过《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那都是中学时背的，也只有那时候才记得住。什么乱七八糟文章我都看，凡是读得懂的都找来，像王若水，那是学界深入浅出的大师之一，我非常佩服他的文章。

1955年，附中成立了“理论学科”，老师说：“理论学科可以有现成的学生啊，李春光就是一个。”还有储望华，他是储安平的儿子，我们一直同班。当然他也没显摆，他爸爸再有名，也不是将军，也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部长，不过是一个知名的民主人士，最后无非就是《光明日报》总编，那算什么？包括郭沫若，许多老革命根本不把他放眼里：无非就是舞文弄墨，毛欣赏他，把地位抬得很高。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算什么？我是军区司令，老子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干吗呢？而且“南昌起义”以后你逃跑了，弄些甲骨文，甲骨文是什么东西？储安平也是，他是办《观察》出的名，但除了文化界，没几个人知道他。所以在“反右”之前，储望华丝毫没有一点儿名人子弟的优越感。

他是白丁进来的，人很聪明，也挺可爱，就是个子小。少年班有个规矩，第一年通通试读，不合适的，退回普通中学。储望华个子很小，手也很小，而且手是软的，立不起来，几次考虑要把他退了。但是他的音乐感觉又不错，犹豫来、犹豫去，一直到他附中毕业，钢琴也不是弹得很好。但是这个人很奇特，说：“你们别笑我的个子小，我过了十八岁才长呢，我哥哥就是这样。”果然，过了十八岁他就噌噌噌，一下蹿起来了，琴也越弹越好。

1957年“鸣放”，储安平说：现在大家只给“小和尚”提意见，但是我要给“大和尚”提意见。于是有了“党天下”的说法，说党控制了一切。储安平很悲惨，后来是大右派，新娶的年轻老婆也跟他离了，嫁给另外一个人，就住在他们家附近。所以储安平几乎天天看见，他所钟爱的年轻美人在人家的怀抱里。大概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那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文革时候，刘少奇都没人关心了，储安平已经是“死老虎”，谁管你？储望华对此也只字不提，而且那时候，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压力非常大，一定要表现得极为革命。所以后来他的许多行为，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也能够原谅。

1957年，那时储望华还小，对很多事不了解，也不知道轻重。但是到了1958年上大学，储望华想学作曲，不让他进，那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作曲、指挥、理论，这三个系都是把政治条件放首位，第一条就是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家里有“关管杀”的都进不去。当时储望华的专业已经很好了，于是钢琴系把他招了，并且后来被留下来。作曲是他自学的，80年代开了作品音乐会，周广仁亲自上去

给他弹。所以我就说：你们不要胡吹，老说“名师出高徒”，没有这回事。而且现在造成一个风气，音乐学院争抢学生，好的都到林耀基那儿去，不然你就接受点儿“困难户”。其实应该倒过来，“高徒出名师”，给你个榆木疙瘩，再大的本事也教不出来。

我和储望华比较要好，不过，我对他的批评也是直言不讳。我说：“你的聪明是万花筒式的、七巧板式的，我们拼不出来，这是你的聪明。但是你的音乐缺少热情，没有一个乐句、没有一个音可以拨动我的心弦。要知道，我并不是心中无弦的人。”平时我们就比较好，那次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也哭了、我也哭了。

三

我是1958年附中升本科，应该1963年毕业，但是大四时被派到朝鲜。经过四个月的语言培训，转到平壤音乐舞蹈大学，校长金元均，《金日成将军之歌》、朝鲜国歌就是他谱的曲。在那里，我见过五次金日成同志，见过无数次金正日“小子”。我那时候二十二三岁，他比我小两岁，是金日成大学的学生，老来找我们搭葛。至于为什么把我弄到朝鲜去，你愿意听吗？那我可以简单讲一讲。

中朝两国关系离奇曲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中苏论战，分歧越来越大。1960年，为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等，一共三篇文章，于是中苏关系尖锐起来。直到1963、64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九评”，达到“反修”的高潮。一开始，朝鲜人是骑墙的，后来基本倒向了苏联。但是朝鲜人的自尊心很强，赫鲁晓夫又比较愚蠢，对朝鲜指手画脚，不知怎么得罪了金日成。金日成一怒之下，不指名的批判苏联，中国一下逮到机会了。1963年朝鲜国庆，《人民日报》以空前的规格，热烈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然后，两国大幅度增加文化交流，比如互派留学生，而且数目相等，表示平起平坐。在这样一个契机下，我被派到朝鲜。

在那里，有几件事情我的印象极其深刻，首先就是物资极其匮乏。作为留学生，我的伙食费一个月是一百多块钱朝鲜币，有个“阿妈妮”（老大娘）专门给我做饭，那就很高级了。但是在食堂，我看见学生吃什么、教师吃什么。第一，终年没有肉，第二，终年没有一滴油，只有一点点鱼干。朝鲜东、西海岸应该有

很多渔场，但都变成军事设施，布满了鱼雷之类，根本不能捕鱼，所以老百姓吃鱼都很困难。商店里，苹果和大花生还比较多，但是没有糖果，没有饼干，那么小孩子吃什么？平壤气温跟北京差不多，夏天很热，加上它的那个沥青路质量不好，软得可以沾到你的脚后跟上。小孩子没的可吃，就把那个沥青抠出来，软软和和的，放在嘴里嚼，像吃橡皮糖似的。当然那一定不好吃，他也未必会吞下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任谁说，我也不会相信。

再比如，那儿有一个特供商店，上下两层楼，面积很小，专供外国人和高级干部买东西。其实无非就是日常要用的，钢笔、墨水、鞋油之类，但是要持特供的卡片，而且每个月有限额。金正日是没有限额的，后面跟一个尉官，随便什么东西，他用手一指，那个尉官就给夹着，我看见他的这种“表演”不止一次。

另外还有一点，包括后来我在美国，有一次跟他们闲聊，我说：“如果你们去北朝鲜住上一阵，你就会知道：相比之下，中国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天堂。”文革多好啊，可以给任何一个领导人贴大字报，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包括省委书记等等，你想反谁就反谁。对毛的个人崇拜，那跟朝鲜人对金日成，根本就不能比了。

比如他们那儿，人人家里都有收音机，但只有一个台，所以只有一个钮可以动，用来调音量的大小。特供商店里，有从中国、苏联进口的收音机，但在出厂之前，把所有频道都焊死。像什么短波、长波，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呢，人人都要戴像章。除了厕所、洗澡房，无一例外，所有、所有的地方都要挂金日成像，像佛龛似的供在那儿。我住一间单独的房子，他们也送来一张金日成像，而且给我一个同样大小的镜框，让我找张毛主席像放里面。我说“没有”，他非常惊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再比如我的导师，那是很有学问的人，有一次问我：“听说在中国，什么戏种都可以演，这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京剧、昆曲，还有秦腔、山西梆子等等，乱七八糟加一块儿，那得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他特别羡慕，因为金日成对传统的东西，喜欢的他保留，不喜欢的就禁绝。比如潘索里，那类似中国的评弹、京韵大鼓，特别有味道。在苏联大百科全书里，专门有个条目讲一位潘索里艺人，把他捧为世界级的大师。但是，金日成不喜欢这东西，当面挖苦说：“我就讨厌你那个‘呜……’”他一讨厌不要紧，这位大师立刻被贬到北方严寒地区，

在一个小道的歌舞团当了普通乐队队员。

课堂上举例子，我听过一点潘索里，不到一分钟，那简直太迷人了，就跟我导师说：“跟中国音乐比起来，大概只有苏州评弹可以跟它媲美，太有魅力了。”一句话说到他心里，跟我讲了上面这些，他当然对此愤愤不平。

四

工作组走了以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先是保皇派当权，叫作“主义兵”，以附中小孩儿为主。其实，那就是一帮不大懂事的“红五类”，很多都是高干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拿鞭子抽人，毫不客气。但是这些人都比较尴尬，比如忽然某一天，啪，他爹被打倒了，他又“黑”了，所以“主义兵”的寿命不长。后来，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我们这派叫“北京公社”，一共就三十几个人。不过我们很铁，始终都叫“北京公社”，不像“红岩”“战斗团”之类乱七八糟什么的，最后联合起来，叫作“1114 纵队”。因为那天是 11 月 14 日（1967 年），就起了这么个名儿，我们还讥笑他们，说是“要、要、要死纵队”。

我不是“北京公社”核心组的成员，从来没当过头儿，但他们说，我是“不是头儿的头儿”。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写上报材料，一般都是一式三份，总理一份，“江青同志”一份，康老一份。康生是大书家，可惜当时我没收藏一幅他的字。今天文物卖那么火，你要有幅康生的字，立刻就可以脱贫，呵呵。

那时常常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不时地有接见大专院校群众组织的代表，那是总理主持的，像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这些人我都见过。1970 年，有一次为各个文艺团体下放的事，专门开了这么一个会。总理说：“李春光来了吗？……你到前面来嘛。”为什么把我叫过去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为我的好朋友郑伯农绝食五天，这事闹得很大。郑伯农的父亲郑公盾是“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顶撞了江青被抓起来，一家子都受牵连。有一阵子，我们把郑伯农藏地下室、藏天花板上，直到工、军宣队来学校，这才不得不把人交出来。我替郑伯农鸣不平，结果把我也关了起来，于是就绝食。父亲写信给总理，最后是总理亲自过问，才把我放出来，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走到总理跟前，他问我多大了，我说三十岁。总理一秒钟的间隔都没有，立刻就说：“解放时候才上小学嘛，你是‘两门’干部。”过去有种说法叫“三门干

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直接进机关门。他说：“不过学校也算机关，你也就算‘三门’了。”接着又问我是学什么的，声乐，还是器乐？我说是学理论的，总理说：“哦？那你是理论家了，实践了没有？”我愣住了，答不出来，总理说：“理论，还要实践。”

我在总理面前站了四十分钟，单独谈话二十几分钟，中间有人吵吵要发言，总理说：“你不要打断，我跟他说几句嘛。”后来他跟旁的人说：“他们送来的材料，摞起来有这么高（按：用手比画，约一尺），我都仔细地看。”那都是我写的，比如像“孙、方、舒、危”，总理一定是有印象，说：“‘孙、方、舒、危’这四个人比较注意了，但是一定要把材料搞清楚。”原话就是这样，我一个字都不会记错。总理又问：“你们‘山’上一共多少个人？”我说三十几个，“一直没有下‘山’吗？没有参加他们的学习？”我说没有。总理说：“看来，你们两派影响都不大。”那时候“1114纵队”是多数派，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九十，但不能撼动一个小小的“北京公社”，一个人都拉不下去，就跟“钉子户”似的。可惜我们也不能感动他们，没一个人投奔到这儿来，所以总理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两派都不能控制音乐学院的局面。

总理说：“文艺界难管，很复杂，谁也不愿意管，就让我来。我哪里管得了呢？想来想去，那就只有把你们送到部队去。”后面的话我记不住了，大意是：下去以后，劳动很辛苦，刚开始腰酸背痛，你们要慢慢适应；不要晒得漆黑、把身体搞坏了，以后回来还得搞你们的专业，该跳舞的跳舞，演戏的演戏。本来我们坚决反对下放，但总理讲得很诚恳、很体贴，非常的吸引你。后来又说了一通，总理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我立刻就说：“总理指示完全符合实际，非常正确，我们一定照总理指示办。”他说：“不要说‘指示’，我也不了解情况，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又贴大字报了。……我们这些老头子，说话软趴趴的，不带劲。‘王关戚’说话带劲嘛，你们就喜欢听他们的话。”

记得总理还说：“你是李一平的儿子吗？你看，你家里我都晓得。……鲁迅的文件你读过吗，‘四条汉子’你知道不知道？”他不说“文章”，他说“文件”，这有一点奇怪。问我“四条汉子”，我说我知道，他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家里有一套《鲁迅全集》，我读过，他说：“那是因为你父亲有这方面的接触了，很多人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希望我说“不知道”。那时

候，工宣队正跟我们闹得很厉害，会上总理就拿我举例，说：“比如李春光吧，今年三十岁，解放时候他九岁，才上小学嘛，‘四条汉子’、文艺黑线跟他有什么关系？”

“北京公社”里有个叫云德海的，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在食堂里蹬三轮买菜，文革时，我们都叫他“云司令”。那次他也去了，并且要求发言，说：“工宣队根本就没做检讨！”总理说：“怎么会呢？”“那是假检讨！”总理说：“怎么会是‘假检讨’？他们两篇检讨的稿子，都是我看过的嘛。……年轻人，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但也要懂得尊重领导。领导嘛，总是经验多一点，但是领导也会说错话。谁不说错话呢？不要抓住一句错话就没完没了。”他是两头做工作，后来一个工宣队的人站起来，总理忽然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四十六岁，“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总理说：“老工人、老党员，就要懂的爱护年轻同志。列宁说了，‘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嘛，不要说起话来就硬锵锵的。毛主席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录音，你们都听过吗？那是多么慈祥。”然后他立刻补充一句，我想他不是很由衷，说：“林副主席，也是这样嘛。”

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中间总理要去处理文件，让大家休息一下，有的人就趴在桌子上睡起觉了。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就说：“总理一天没有休息，明早九点钟还有个外事活动，我有一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待会儿总理出来，如果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问题，可不可以就不要主动提问了？”后来总理出来，大概已经过了十二点，他让大家继续提问。大家不吭气，总理说：“哦，刚才讲到‘二流堂’，这个事情我要继续把它讲完。否则，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了，没有人能讲的清楚。”又讲了一通，关键一句话是：“这件事和郭老没有关系，不要扯到郭老身上去。”“二流堂”当时成为一个大案，吴祖光、黄苗子等等都成了右派。我看过黄苗子的亲笔交代，里面乌七八糟，各种低级下流的事儿都有。其实，“二流堂”这个名字就是郭沫若起的，怎么会和他没关系？

之后，总理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还不吭气，于是总理就翻他手里的那份名单，开始主动提问。“中央歌舞团，你们那里跑了几个人，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再详细讲一讲。”那人很啰唆，讲了十几分钟，总理说：“你们现在一共关了多少人？”那时候抓“五一六”，都是隔离审查，他大概说是七十，具体我忘记了。总理说：“怎么会这么多呢？材料确实的有多少？”那人又说了

一个数，总理反应很快，说：“哦，减少了一半，我还是不相信，不可能的嘛。”后来他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提问，最后说：“把你们送下去，那是因为没有办法了。但下去以后，我不是不管你们了，有什么事情，你们还可以写信来嘛。”

就这样，谈到差不多快早上七点了，总理说：“还谈吗？……天都亮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就到这里吧，好不好？”于是就这样结束了。那是多么客气、多么和蔼，听着舒服极了，多少年都没有人这么跟我们说话。工宣队，那都凶得跟流氓一样，什么时候用过这种口气？

十天之后，我们就下放了。中央音乐学院分三个地方，其中部分师生、教职员到了清风店，被38军接管。38军很牛了，在全国野战军当中，是装备最好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说：“马克思有个助手是恩格斯，列宁有个助手是斯大林，历来都是这样。毛主席也有个助手，那就是林副主席，而38军就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铁军’。”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还教我们唱他们的军歌，直到林彪出事，那都是后话了。

下去以后，第一个月不干别的，下发总理发言的材料，叫作“五九指示”，让大家学。因为我是总理单独找去谈话的，材料上开头好几页大概都是这个。那我当然就成左派了，成为音乐学院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但他们没想到，我是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脾气。毛主席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连着写了三份意见书，搞得他们很恼火。那个“二号”人物，是个团副政委，在大会上说：“我要提醒你啊，因为写意见书而犯错误的，大有人在。胡风不是写意见书吗？彭德怀不是写意见书吗？李春光就是音乐学院的胡风、彭德怀。”所以，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把我也揪出来了。

“五一六”确实有这么一个组织，叫作“五一六兵团”，我也搞不清是哪里的。北外有个“六一六”，也是公开贴大字报，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毛是造反派的首领，保皇派保的是走资派，他们认为，周是保皇派的黑帮老大，所以光明正大的反周。总理曾经有一句话，说：“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我见‘六一六’的几个人，有几个的口才真是不错。我希望‘六一六’出几个人才。”要知道，那是反总理的一个组织，但是周希望，他们能出几个人才，我对这个的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大规模的抓“五一六”，那就变成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凡是反总理的都是“五一六”分子。那38军最凶狠了，所有造反派都被打成“五

一六”，没有一个漏网，也包括我在内。关了我一年多，说我“反军乱军”，于是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很可笑，我怎么会反对总理？但是“县官不如现管”，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很晚才公布，所以那年没有“十一”游行，说是为了战备。那时候我还被关着，但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发现“十一”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没有毛主席像，也没有发社论，我就知道要有大事发生。后来又过了一阵，已经比较冷了，忽然下达通知，讲林彪事件。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比革命群众还要晚几天知道，但听了以后，我是一身的冷汗，毛骨悚然。

震惊，非常震惊，而且充满了恐惧，之后又带着一种茫然。林彪突然变成这样，可见中央上层的斗争有多么尖锐激烈，完全出乎你的想象。忽然我就有一种感觉，像我们这样的人，将来可能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从那时起，我对毛的信任度就大幅度的衰减了。后来又批林批孔什么的，越搞越荒唐，而且有人依然极其忠心耿耿地跟着江青跑，我就觉得不能原谅了。我们家跟汤家很熟，像汤一介，我们从小就住一块儿。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他还那么积极，到体育馆作报告之类。因为那些材料都是他编的，现在叫“国学大师”了，但你就没有一点儿头脑，那批林批孔是干什么的？

五

1975年8月8日，我写了一篇大字报，后来被历史博物馆拿走了，给我一个复印件，现在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前几年有人把全文贴在网，叫“李春光1975大字报”，回头我可以传给你。

那时候，忽然传达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七二五批示”，那是一部关于大庆石油的电影，歌颂余秋里。不管怎么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把大庆油田搞起来，那就是丰功伟绩，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得都很来劲。但是，歌颂余秋里就是歌颂刘少奇，江青不干了。文化部搞了个“十条”，把电影批得体无完肤，说是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等于这就是个反革命“毒草”。当然大家就很气了，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其实他也不敢写，是贺龙的女儿贺捷生鼓动的，而且她神通广大，给送了上去。毛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

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当时我们正在首钢劳动，全给叫回来，在天桥剧场听传达毛主席指示，后面是文化部核心组的表态。回来以后，系里找间大课室，组织大家讨论，但是冷场，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这是天大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背后到底是怎么样，既不鼓掌，也不交头接耳，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党支部书记说：“李春光发言，你带个头儿。”

当时我一听这个批示，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很震动。没想到毛会讲这个话，会支持一下人家对江青荒谬、霸道的反抗，这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根本没想到。党支部书记发话，我站起来，说：“凭什么让我带头？你怎么不带头？”后来有人要发言，是个积极分子，看风使舵、向上爬的那种。但是他的水平不高，不会看风，也不会使舵，愚蠢到还要拍文化部的马屁、抱江青的粗腿。他说：“听了文化部的表态，我很感动。从前毛主席有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宣部、文化部根本不让我们知道，但这次不同了。毛主席批示才几天啊？立刻就传达了，直接传达到每个党员和非党群众，而且回来让讨论，征求大家意见。这，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之下、经过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文化部。”

本来我对这人就很看不起，他慷慨激昂说了这段话，我忍不住了，说：“我说两句吧。”这一说就不可收拾，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四个小时，有无穷的话要说，而且都说出来了。当时，我们每天的记录要上报文化部。那个记录员人很好，但是文化水平很低。关于我的记录一共两页半，我一看，哎呀，很重要的话他没记上，不重要的话写了一大堆，而且写的不清不楚、错白字连篇。党支部书记跟我比较要好，说让我看看，修改认可之后签字。于是我就写：“错漏甚多，李春光。”

后来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它写成大字报。回家之后，很快，简直是不假思索，哗——，就写下来了。我妈妈在旁边，我写一页，她看一页，然后就唉声叹气，说：“你真要贴啊？……哎呀，你真的要贴？”我说：“老太太，你呢，要是看着胆战心惊，就到外面散步去，我写完了再给你看。不贴的话，我写它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你就别在这儿唉声叹气，我也没时间了。”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很快我就写好了，是一份详细提纲。

第二天清早，我到郑伯农那里去，正好他弟弟、他妈妈也在家，我就读给他们听，一边读、一边完善。郑伯农没有发表意见，他这人有时不大乐意吭气，可

以跟你相坐两三个小时一言不发，我已经习惯了。他弟弟叫郑仲兵，过去是民族学院的群众领袖，知名度很高，他喜欢说话，说：“你不要这样胆大妄为。”于是我把他们骂了一通，转身就走。他弟弟还不善罢甘休，拍着我的肩膀说：“李春光啊，李春光，你读这稿子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是你回去看看，你妈妈头上还有几根白头发呀。”意思是，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爹娘的安危。当时我很激动，说：“别来这套，你们是阻挡不了我的。”

回家以后，就在那个吃饭的大圆桌上，我让我的妹夫帮我抄。因为我写字很慢，而且比较难看，他的字比较好。就这样，我一边读，一边做增删、修改，他就在那里抄。

原稿后来扔掉了，因为那只是份提纲，而且写的乱七八糟，别人看不懂。然后，我的妹夫又照着那份大字报，复写了三份，算是留底儿。然后我就到学校贴去，围观的人非常多，一下子就传开了。中间曾经受过阻拦，因为我贴的比较矮，校党委书记让工人弄些沙子堆底下，所以下面一张有半拉都看不见了。但是一传十、十传百，拦也拦不住，很多外面的人跑去看，晚上还有打着手电筒去瞧的。据说李泽厚也去了，后来有一次见到李慎之，他说当时也跑去看。刘德海，那是琵琶大师了，《十面埋伏》就是他改编的。他家就住在对面的2号楼，有一天下大雨，他们夫妇俩跑去看，发现没有一滴雨打字那张大字报上，刘德海还说：“天意呀，天意。”

2006年，香港出版了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面有一节就讲到李春光的大字报这件事。

邓力群的侄儿叫邓启元，在音乐学院学唱歌。回去跟他叔叔说，音乐学院有这么一张大字报，引起轰动，于是邓力群让他抄一份看看。那份大字报始终都没被覆盖，也没人敢公开扯下来，因为大字报属于“四大自由”之一，但是有人在那儿值班，一个字都不准抄。于是邓启元跑到我家，说是看看底稿，抄回去学习学习，之后经由邓力群，传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当时是那儿的头儿，他非常欣赏，打印出来，政研室人手一份，说是要“学习李春光的大字报”。据邓力群回忆，乔木说：“这样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后来，胡乔木把文章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立刻递给毛主席，毛批示说：“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还给了邓小平。

没过几个月批邓，工宣队的头儿不断找我谈话。那是个首钢的师傅，其实我们挺要好，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拍桌子、砸板凳，“砰”一摔门走了，天天都这样。比如他们老问：“你的后头是谁？”老想把我跟邓小平扯一起。但我后头谁也没有，我说：“我见过很多人，见过周总理，见过康生，也见过春桥同志、文元同志，还跟叶群同志谈过话，唯独没见过邓小平，让我交代什么？”而且我不做牵线木偶，什么时候说话、写文章都是独立的，不需要背后有任何人，所以很快就把我逮起来了。于会泳⁹召集专案组开了八次会，说：“我们知道，这个头很难剃，但是一定要剃。江青同志说了，李春光的大字报已经成为邓小平政变的材料。”这是后来于会泳被揭发，他自己说的。

关了我三个多月，不久毛死了，紧接着“四人帮”垮台，这才把我放出来。之后，《人民日报》要发这篇文章，找到我，问可不可以改，比如“主席”改成“毛主席”等等。我说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也没有权力去改任何一个字。他们还没发呢，新华社来了，最后是由他们发的通稿。

1976年12月，新华社发通稿《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所有报纸都在同一天发。所以后来我接到很多素不相识、从各个地方寄来的报纸，包括从四川一个小的县城，那是地区性的报纸，大家都在发这个东西，而且是头版头条。当天早上七点钟，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把新华社的通稿读了一遍，又把《人民日报》的短评读了一遍，恰恰半个小时。晚上在《新闻联播》又读一遍——当时没有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是广播电台。一年以后，华主席在人大大会堂接见，握着我的手，说：“李春光同志，你的文章写得好啊，你的反潮流精神好啊，值得我们学习。”

曹禺的女儿万昭和我附中的同班同学，开始时，她曾经从我这儿抄了一份，回来说：“哎呀，我爸爸天天读，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屋里高声朗读李春光的大字报。”当时我不懂，真应该让他女儿录一下，那一定是稀世珍宝，因为他是很好的戏剧演员，对朗诵不是一般地在行。新华社在发通稿时，拿掉了一些具体人名，并且删了三个字，“总理的话，你们（指文化部）可以置若罔闻。总理指示，对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他们大概觉得不文雅，把“顶个屁”给删掉了。曹禺就说：“他们不懂啊，这个地方就要这样，‘顶个屁’！”

⁹ 于会泳（1926—1977）：山东威海人，戏曲音乐家，197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次年隔离审查，服毒自尽。

他很激动。

后来曹禺请我吃饭，说：“你的这篇文章，我正背如流、倒背如流。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这一篇。而且二十年内，不会有第二篇更好的文章，你自己也写不出来。”

六

1976年1月，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在西单，大家哭成一片，那真是感天动地。天安门布满了花圈，都是自发去悼念的人。那时候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去，后来有了“四五运动”，那天我也去了，骑个自行车。不过那次还比不上“六四”，只是民兵拿着棍棒，从中山公园冲出来。广播里不断播送吴德的讲话，播送《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那歌儿，人们“哗——”就从广场往外跑，但是跑完就完了。

到了9月，毛去世。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追悼大会，那么隆重、那么宏大。但跟周的去世很不相同，完全是官方组织的，排成方块什么的，实际没那么多人悲痛他。10月6日，江青被抓起来，“四人帮”彻底倒台了。

从前我是又红又专，还被派出国，虽然写了十几年入党申请书，但始终入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家觉得我应该是党员了，也让我参加“十一大”，有人还提议，让我当“第一副院长”。但是现在，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始终我都不能写这个申请书。

我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想说的话，你打死我，我也要说；不想说的话，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刚开始文革时，我们是满怀热情，而且充满了希望。文革结束了，我们激动万分，觉得大快人心，以为社会终将走向科学、民主、法治。我们的思想都很简单，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绝对拥护党，绝对相信祖国的繁荣昌盛，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但是现在我知道，没这么简单，没想到“六四”邓小平会开枪，没想到贪污腐败如此盛行，没想到社会变成了今天这样。

我以为，中国的悲剧，就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叫作“官僚资本主义”。毛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相信这句话，但那必须是真实的社会主义。❏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